



主 办：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  
临沂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主 任：姜仕礼

委 员：李洪彦 段 洪 唐少清  
张新荣 卢少林 王文博  
王卫东 陈宏图 李树峰  
钟 海 黄夫群 刘如彬  
程丽丽 邵 勇 杨 岩  
侯宗良 刘焕英 周宗青  
石洪欣

主 编：李洪彦

副 主 编：唐少清 呼国英 高 雷

特邀编审：曲文军 王纪明

责任编辑：杜 帅 徐希冕 张广卫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 1310012号

# 目 录

## 【本期特载】

父亲朱瑞在长征中 朱淮北 04

## 【峥嵘岁月】

沂水长流——1941年反“扫荡”突围记  
刘景华 口述 张 扬 代笔 10  
老红军常万富(下) 李 冰 15  
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抗日政权的创建和发展(下)  
赵 炯 22

## 【名人素描】

谢立全：《西行漫记》“小号手” 唐 蕾 28  
“忠孝两全”宋鸣梧 仇同如 32

## 【文化掇英】

我与战友刘知侠 李治亭 35  
沂蒙大地一支笔(五)  
——惠玉昆先生的书法历程和业绩 刘瑞轩 38

## 【探索发现】

东夷故乡寻踪(五) 高 雷 42

## 【史海撷萃】

诸葛恢嫁女 雪 花 46

## 【文史论坛】

沂水“孟母故里”考(下) 刘海洲 49

## 【蒙山沂水】

临沂名吃(上)	亦名	54
老家那一域里的“四大件”	郑玉强	61
“沂蒙古村落”之——崔家大院	耿志刚	63

## 【影像沂蒙】

《沂蒙抗日根据地图志·人物》——黎玉	本编	66
--------------------	----	----

## 【古城旧事】

扑灭朱陈霍乱疫情始末	于岸青	68
------------	-----	----

## 【百家渊流】

费县的三个古老姓氏	平凡	73
-----------	----	----

## 【沂蒙乡亲】

南下浙江余杭(一)	刘敬宗	77
-----------	-----	----

## 【工作动态】

本编	80
----	----

封面：崔家大院

(详见本期《“沂蒙古村落”之——崔家大院》)



地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编：276000

电话：0539-8727562

邮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2000册

发送对象：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系统内部

# 父亲朱瑞在长征中

朱淮北



红军时期的朱瑞

1934年8月，中革军委调朱瑞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自1930年6月组建至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期间在1935年7月至11月曾经改称过第一军及陕甘支队第一纵队。这是一支由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组建起来的英雄部队。先后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有六人，朱瑞自1934年9月至1936年12月任政治部主任，是六个人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人。朱瑞在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期，也正是红军开始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直至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陕甘的时期。

长征是艰苦、悲壮、英勇、伟大之举；亦是我党我军因错误路线主导，连续失策而造成的被动之举；是在战斗不断失利，许多指战员思想困惑，情绪低沉时进行的；是在根据地越来越小，广大指战员不得不背井离乡、舍弃亲人时进行的；也是在中央决策极度保密和匆忙，不少指战员对前途不明了，对出路充满忧虑时进行的。面对干部、战士们的失败之忿，离别之苦，失望之意，迷惘之情，作为刚刚到职的军团政治工作主要负责人，朱瑞面临的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长征出发前后，朱瑞多次做动员和政治报告，

稳定部队情绪，消除战士疑虑，增强干部信心，鼓舞大家斗志。在紧张激烈的抗击白军围追堵截的战斗中，朱瑞组织各级政工干部加强思想关怀和政治教育工作，防止逃亡并不断加强扩红工作，以保证部队稳定和增强战斗力。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初步清算了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调整了中央领导。会后朱瑞按照中央部署和军团的分工安排，向下传达会议精神。1月19日上午，红一军团在贵州遵义城北召集部分营以上干部和机关全体干部大会。朱瑞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当听到说毛主席重新出山了，大家欢欣鼓舞，士气大振。朱瑞还多次主持红一军团政工会议，总结作战行动，宣讲民族政策，部署政治工作任务，以确保战士们克服失望、埋怨等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以昂扬的斗志面对连续战斗和行军。

1935年5月24日，红一军团红一师一团经过80多公里急行军，首先到达四川省石棉县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控制了渡口。此处河宽100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耸立，川军第五旅第七团一个营构筑工事，凭险据守北岸，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能否跨越这道天险，能否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惨剧，关系到整个红军长征的成败。5月25日拂晓，朱瑞急召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李水清到政治部，彻夜未眠、满眼血丝的朱瑞指着桌上的作战地图对李水清说：“昨夜，杨得志团动作神速，歼敌两个连，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南岸渡口，还缴获了一只渡船。军团首长决定由你带领宣传小分队赶到红一团，慰问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员，参加他们的战前政治发动工作。马上去，越快越好！”朱瑞还强调了这场战斗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李水清受命后立刻跑回宣传队，联系军团总务处长梁必业，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翻遍家底筹集了一些慰问品。然后李水清率队赶往安顺场渡口，杨得志团长、黎林政委带着一营长孙继先迎接李水清一行。李水清向他们转达了军团首长的慰问和期待，传达了朱瑞主任关于渡河战斗重要意义的指示。随后以军团政治部的名义向熊尚林等17名突击队员和孙继先营长赠送慰问品，每人一条白毛巾和一个搪瓷碗。清晨七时，红一团一营二连长熊尚林率领17名队员登船出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奋力拼搏，在船工的配合下，在团机枪连和团炮兵营的火力掩护下，冲破重重火力网登上对岸。智勇双全的突击队员猛烈冲杀击溃守敌，控制了北岸渡口，巩固了滩头阵地，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

1935年6月上旬，中央红军行进到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化无常，时晴时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红军6月12日开始翻越雪山。红一军团政治部的队伍从早晨两三点出发，行军到下午，不少人渐渐感到疲乏无力，精神困顿。为了给大家鼓劲，朱瑞就提高嗓门对大家说：“同志们，我给你们猜个谜语吧，大家说好吗？”大家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倦意立刻消失了。朱瑞说：“慢慢行。打一个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宣传队机灵的小队员不费脑筋就抢答道：“慢慢行不是徐向前嘛！”朱瑞又问：“谁是雇农。”有人答：“何长工。”朱瑞再问：“耳朵向上。”又有人说：“张闻天。”朱瑞慢条斯理地说道：“刚才那几个容易，现在说个难的吧：能知诗词歌赋，总是哈哈连天，曾为花中魁首，可惜不能高攀。”这一下把大家难住了，想了半天也猜不出来，纷纷说：“朱主任提示一下吧。”朱瑞说：“这个谜语看起来很难，其实最好猜啦。他呀就在我们这支队伍里走呢。”军团政治部不过几十名同志，大家你指我，我指他，七嘴八舌一会就猜出来了，是宣传部的科长文笑梅同志。朱瑞说：“对，梅花了不起呀，它是花中之魁，数九严寒迎风怒放。我们过雪山就要发扬梅花傲雪的精神呀。”几个谜语一猜，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又精神抖擞地前进，不畏严寒和高山缺氧等多重艰难险阻，征服了神山。

长征中朱瑞受林、聂首长委派，经常与红一军团的前卫部队一起行动，为全军打先锋。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根据中央主力北进的方针，朱瑞和红二师师长陈光率红六团及军团警卫营，作为前卫部队向卓克基前进。中途遭遇小金川藏族土司武装的袭击，在喊话劝说无效、反被土司武装射杀我几名指战员后，朱瑞、陈光下令前卫营坚决反击，土司武装一冲就垮，红军一直追击到风景秀丽的小金川河畔富丽堂皇的土司宫前。考虑到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朱瑞、陈光与红六团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商议后决定，先礼后兵，派人与土司谈判交涉和平解决，红军借道北上。冥顽不化的土司拒绝谈判并杀害我前往谈判的干部。朱瑞、陈光立即找来红六团负责人研究，果断决定以夜袭手段坚决攻占卓克基及土司衙门。天黑后，几颗照明弹划破夜空，腾空而起，光芒四射，红六团分路发起攻击。愚昧无知的土司及其士兵看到照明弹，以为红军施了什么“法术”，整个土司宫乱成一团，吓得个个四散逃亡。红六团兵不血刃占领了土司宫。红军主力部队陆续在这里休息，并到附近的马尔康地区筹粮。

1936年6月28日，朱瑞、陈光率前卫部队到达康猫寺。此时胡宗南在蒋介石的严令下，集结12个团的兵力在松潘一带布防，阻止红军前进。于是，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队，控制松潘以北及西北各道路，就成为红军向北作战和发展的关键。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以两个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行进。林彪军团长部署：朱瑞、陈光率红六团及红五团一个营作为全军先遣队，一面探路一面筹粮。由康猫寺左侧经上、中、下打古口，从松潘西北面迂回包围松潘；林彪率红四团及红五团两个营从右路出发，经黑水、芦花向毛尔盖前进，从正面进攻松潘；聂荣臻政委率红一师及军团司令部在康猫寺、马塘之间驻扎并筹粮，等待朱瑞、陈光先遣队的报告再决定行止。6月30日，朱、陈先遣队由左路前进，朱、陈及六团王集成政委亲自到前卫营指挥。7月1日，前卫营行至中打古口与查理寺之间时，遭遇敌1000多骑兵突袭。红军当时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队伍很快被敌马队冲散。朱瑞、陈光立刻命令王集成集结被冲散的队伍，由朱瑞、陈光向大家介绍对付骑兵的方法，稳定队伍，继续英勇拼搏，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由于敌兵力在我一倍以上，我指战员多日行军作战，饥饿疲劳，体力不支，加上连续下雨，冻饿难耐；而且装备不足，在空旷的草原上对付骑兵居高临下的快速冲杀极其困难。在战斗和冻饿之中我军伤亡百余人，前卫营营长牺牲，陈光师长和王集成政委负伤，此役是红六团自长征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夜幕降临后，朱瑞、陈光将前卫营撤回中打古口，返回时，沿途筹不到粮食。若非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令红二师宣传科长舒同运粮赶到中打古口，先遣队四个营都可能因冻饿而大量减员。左侧探路失利，在中打古口休整时，朱瑞、陈光于7月2日写了关于检讨中打古口战斗失利的报告并向总部提出：“根据地形、敌情、道路、群众、粮食等条件，依我现在兵力，由此迂回松海及松潘以北是不可能的。”这个报告为总部决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于是总部放弃了从左路绕向松潘的方案，集中力量沿黑水芦花向毛尔盖前进。

在长征中有一段朱瑞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插曲。长征出发时红一、三、五、九等军团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分别改称第一、三、五、三十二军，与红四方面军各部称谓统一。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8月8日中革军委电令“委周恩来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9月4日中革军委在“决定委周昆任方面军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的电令中道：“决定委调周昆同志任方面军参谋长，朱瑞同志原决定任政治部主任，周应即来，朱瑞在一军开动时来。”这表明朱瑞是在9月4日前被任命为重新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也表明直至9月4日朱瑞并未到任。当时朱瑞与红一军团走在全军的最前



1936年红军干部在陕北，前排右起：杨得志、邓华、朱瑞、熊伯涛、孙毅，后排右二为萧华。

面，已向甘南挺进。9月10日党中央率红三军及中央纵队紧急北上，并于9月12日在甘南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和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9月18日在哈达铺正式改编，红一方面军的番号撤销了。在此一个多月的时间朱瑞未离开过红一军团，故朱瑞的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有任命未到职、未等到任就机构撤销的职务。

1935年10月，红一军团到达陕北，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月1日，朱瑞在《战士报》“新年献词”一栏里发表了《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一文，全面总结了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艰苦历程和所取得的伟大战绩和辉煌胜利。文章最后说：“这一年，我们经历了闽、粤、赣、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十一个省，历时三百六十余天，行程两万五千余里……这一年，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越过了巍巍雪山，跨过了茫茫草地。我们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变之身驱，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到达陕北后，朱瑞在红一军团先后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为巩固与发展根据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迎接红二、四方面军而紧张艰苦地工作。尤其在陕北根据地西线的统战与敌军工作中卓有成效。

1936年红军西征进入甘肃、宁夏地区，在清水河与东北军第一〇五师隔河相对。周恩来曾派人致函该师师长刘多荃做工作，刘表示愿意暗中同红军保持联系与合作。朱瑞同一〇五师参谋长董彦平、团长王景烈、葛彦春等多次谈话，分析形势，晓以大义，阐述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抗日的主张，使他们赞同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朱瑞也亲自做东北军下层官兵的工作，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朱瑞带人到清水河西岸一〇五师驻地，向基层官兵宣讲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朱瑞深入浅出、情真意切的讲演，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整个会场由初始的鸦雀无声，逐渐唏嘘声一片，最后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坚决不打红军”“打回东北老家去”等口号。通过反复广泛的工作，隔河对垒的形势得以缓和，两军经常往来。每当东北军到河东来，彭德怀、朱瑞等常出面讲话，红军指战员带领东北军人员参观营房，观看操演和训练，组织座谈会，篮球比赛和联欢会。红军宣传队经常到河西给东北军表演节目。通过这些活动，加深了东北军对红军的了解，提高了他们的爱国觉悟，密切了两军的关系，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正当两军关系取得突破时，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命令刘多荃师向红一军团进剿。当时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卖力进剿红

军，遭多次打击仍执迷不悟。1936年10月，马部向红军进攻，被红军击溃并合围了其骑兵团，马家兄弟紧急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点名东北军一〇五师救援。张学良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十分为难，刘多荃更是进退维谷。时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刘澜波是西北剿总司令部骑兵团副团长黄显声的秘书，又是刘多荃的族弟。刘澜波得知情况后，迅速派人密报朱瑞。朱瑞与彭德怀商议后，决定以打假仗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方案上报中央获批后，朱瑞立即派时任中共陕甘省委白军工作部副部长的刘培植前往平凉。刘培植坐王以哲的汽车赶到平凉，与王以哲、刘多荃会商，将彭、朱关于打假仗的办法转告他们。做法是红军让开一条路，让一〇五师按指定路线开进，朝天打枪、开炮，接走马部骑兵团。王、刘连声称赞这个办法高明，双方马上拟定了打假仗的“君子协定”。10月16日交战当天，刘澜波等东工委的地下工作同志赶往前线观战。只见红军让开大路，对空放枪，刘多荃率部在刘培植的带领下，沿着指定线路前进。官兵一路对空射击，一〇五师炮兵团出动了25门大炮，蒋介石也为此战派出五架飞机助威。在隆隆炮声中，一〇五师“气势汹汹”地冲过来营救走了马家军的骑兵团。朱瑞战前安排在东北军经过的路旁张贴标语，组织老百姓送水等。这次假仗应付了蒋介石，给了东北军面子，也是一次对东北军政治宣传和统战争取工作。此后，一〇五师刘多荃师长和二旅唐君尧旅长每遇蒋介石派人检查、督战时，就派人过河与红军联系，商谈他们进攻的时间、地点、路线，红军退却路线、时间、地点以及反击事宜，彼此按预案实施。“战斗”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不过是给蒋介石及其特务们看的“演习”。因为弹药有限，补给困难，这种仗打多了红军吃不消。彭德怀找朱瑞研究后决定打假仗时，红军只吹号不放枪。朱瑞派刘培植过河与刘多荃、唐君尧交涉，明确红军的弹药不能浪费，要留着打日寇。刘、唐听后立刻表示打仗听不到枪声是要露馅的，不就是缺子弹嘛，我们可以拨给你们一些。谈完后刘培植前脚过清水河回来汇报，后脚东北军就把子弹送过来了。

《彭德怀自述》中说：1936年8月初，红军与东北军何柱国部在固原、海原一线对峙。“我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我军派朱瑞和他谈判”。原东北军骑兵团军长在回忆文章《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中说：1936年8月间，上峰“命我从西峰镇驰赴固原指挥所，指挥骑三师、骑六师、骑十师、步兵一一四师和一一八师，前往堵截陆续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阻止他们与陕北的红一方面军汇合。我的防区在平凉、固原、海原、同心城一线。当时红军要通过我军防区，双方已进入战争状态。”张学良曾明确指示何柱国“红军来了不要打，红军走了不要追”，但事属机密，不便向下传达，不敢公开下令，何部下属将领也有执行“总部”命令打红军的。朱瑞奉彭德怀之命，从红一军团驻地宁夏豫旺堡出发，由红区进入白区，南下直奔甘肃合水、镇原之间的西峰镇。时值8月，边塞早寒，已然棉衣加身。朱瑞化装独闯何柱国军部，自称是某县秘书，求见何军长汇报共军情况。何柱国的副官于哲（又名于贯宜）将朱瑞叫进自己的房间询问，朱瑞开门见山说红军彭德怀司令员派他来联系机密事宜，名叫朱瑞，为防止意外，故化装冒名而来。说完拆开棉衣将缝在里面的信交给于哲。于拿信到对门向何柱国汇报，何一看是彭德怀的亲笔信，信中说红军北上抗日救国，已达同心城附近，请何部让出海原、同心城之间的通道，以便接应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详情由彭部的政治部主任朱瑞面议。何柱国看信后叫于哲请来入内，于哲对朱瑞说我们是初次见面，职责所在还请原谅。朱瑞一听立即解开衣扣，敞开心怀让于哲搜查。朱瑞进到何柱国房间，何吩咐于哲：我们谈话时，不许任何人进来，对外宣称朱是军长的同学，安排好住宿并保证安全。何、朱先后密谈了三次。对于给红军让路，开始何是有疑虑的。当时双方仍处于交战状态，所谓“兵不厌诈”，不能不有所戒备。况且何的周围有不少蒋介石的中央



军，万一走漏风声，或被特务告密，就有“通敌”大罪。朱瑞针对何柱国的疑虑，详谈了中共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中国军民共建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红军在陕北与东北军接触后的策略改变等等。并且提出在东北军移动时，红军也给予方便，保证决不攻击。经过反复耐心的工作，何柱国打消了顾虑。双方交流了情况，具体研究了红军通过的路线和时间。朱瑞也向何柱国保证红军会快速、有序地通过让出的空隙，决不惊扰附近的部队。就这样经过朱瑞真挚诚恳与卓有成效的沟通和劝说，何部与红军达成了让道协议。何柱国为了保密和不使张学良为难，不经请示，自作主张，悄悄地调整了军队部署，在海原与同心城之间空出一条通道。红军主力于8月底迅速向西出动，控制中宁至固原大道。9月9日红一军团组成特别支队南下甘肃会宁、静宁、隆德等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1936年十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

蒋介石阻止红军会师的企图失败了，但其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政策未变。他对在陕甘宁边区的“剿共”战争还甚为乐观，以为红军已到穷途末路。一面在国共两党谈判中狂妄要求收编红军，一面命令所部“猛进穷追”，欲在短期内歼灭红军主力于长城以南，黄河以东地区。中央军胡宗南部、东北军王以哲部受命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推进。中央军委下令：会师后的红军主力“应立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准备打第一仗”。1936年11月17日至21日，红军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实施山城堡战役，歼灭与击溃敌军一个师另一个旅，使蒋系胡宗南第一军第七十八师损失惨重，第二三二旅大部被歼，迫敌全线后撤。蒋介石为掩盖失败真相，竟然特令胡宗南对其他各部谎称未受损失。山城堡之战是几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战，也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的最后一仗。挫败了蒋军的疯狂进攻，大振了红军的军威，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增进了红军内部团结，发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促进逼蒋抗战的实现。战役胜利是决策指挥正确，红军团结战斗的结果，也是彭德怀、朱瑞领导的西线统战与敌军工作成效的体现。战前我军将在古西安州地区俘虏的东北军人马放回，加强了与王以哲部的联系，劝说王部尽力缓进以孤立胡宗南部。山城堡战斗时，朱瑞率红一方面军特务团和红一军团特务营组成的支队，在环县、洪德城以西阻滞东北军各部前进。11月18日8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朱瑞支队附电台，以经豫旺堡以西取间道急行军进同心城、豫旺堡之间，相机袭击胡宗南指挥部（王家团庄），或扰乱周（指胡部第四十二师师长周祥初）孔（指胡部第九十七师师长孔令恂）后尾为宜。惟须注意马鸿宾部。”由于对东北军工作的成效，11月20日王以哲部还滞留在距山城堡三天路程之处，坐视胡宗南部孤军深入。21日，我红一、十五军团围歼胡部二三二旅时，右路东北军仍远离战场，使红军痛宰蒋系主力得以胜利实施。

曾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工作的原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水清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朱瑞主任抱有一种特殊的敬重。这位出身于江苏宿迁书香门第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北伐时期就参加革命，后留学苏联，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是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的高材生，堪称军政兼通。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再破旧的衣服穿到他身上，也显得大方得体，加上有学问有涵养，从来不讲粗话，确实极具儒将风度。朱瑞主任还有个特点，就是性格开朗，活泼随和，待人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关爱部属，讲革命道理既朴实又风趣，大家都听不够。”

原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回忆文章中说：“朱瑞是红军中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的音容笑貌，在我脑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 沂水长流

——1941年反“扫荡”突围记

刘景华 口述 张 扬 代笔

—

秋收以后，临（沂）、郯（城）、邳（县）地区处于紧张状态，码头镇、郯城、临沂、枣庄和台儿庄都有大量的日、伪军频繁调动，集结。

农历八月二十深夜，敌人突然倾全力开始远距离奔袭，分进合击，以层山、涌泉为重点，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沂河区。西路敌军在上午8时首先和住在层山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二旅一部及沂河支队一齐接上了火。差不多同时，南边、北边的敌人一齐投入了这个狭小的地区。多于我们几十倍的敌人像潮水一样的往中间汇聚，向我们逐步压缩，不间断地进逼。

10时多，部队撤至涌泉，发现前面已有重敌列阵相待，而后面敌军又已经尾追上来。在这种四面重重包围的情况下，为了争取主动，我们利用一道黄土坎自然地形，向敌人抗击。

宽广的平原上，飞扬着遮天蔽日的爆尘，子弹呼啸着飞来穿去，敌人发疯似地用炮火轰击着我们的临时阵地。



八路军反“扫荡”

飞机也赶来参战了。我们没有高射武器，部队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分散地据守着阵地，难以组织对空射击的火力。这样我们要继续抗御着地面敌人的攻击，又要躲避敌机的空中扫射。趁这机会，敌人从四面八方冲了上来，将我们部队、机关完全冲散，失掉了一切联系的可能，完全失去指挥。敌人凭着人多、火力强，几个、几十个地对付我们一个人。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地单独作战，只要手和脚还能动就坚持战斗，枪托、刺刀、拳脚一起打向敌人，敌我展开了最激烈的混战。这时分区政治委员赖国清同志受了重伤，大家忙去照顾他，却被他用手推开，他用衰弱但是坚定的声音说：“你们走吧，我不行了。分散突围，为了明天坚持冲出去！”他说完话就牺牲了。同志们按照政治委员的最后指示，满含眼泪，从各自面前就地向敌人猛冲。我们带着满身血污，拼着最后的力量向外突围。

## 二

我当时在分区当侦察参谋，是和三专署专员丁梦荪同志、郟城县大队大队长朱继箴等同志在一起突围的。十几匹马都湿透了鞍鞮，汗淋淋地跑到武河东边时，又遇见满地遍野的鬼子骑兵迎面扑来。朱继箴同志看情况十分危急，若再往前去，便要 and 敌人面对了，立刻要我们把马扔掉，缩小目标，分散开穿过眼前一片树林。

我丢下马向前走时，它却恋恋不舍地紧跟在身后。赶它，用土块投它，都不管用。想想它驮着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到现在浑身是水，口吐白沫，还这样亲切地一步不离，要一枪打死它，心里实在不忍。要不想法弄开它，这样一匹大白马，却正好是招引敌人的目标。我停住脚步看看它，它也停住脚步喘息着；我一挪动，它又跟着迈步。眼前的情景，引起心里一阵焦躁、辛酸，我看了白马一眼，立即转身疾走。

穿过树林，进了吴家庄的圩子。我一步闯进一座敞亮大门，院里是一片瓦房，我知道是进了地主家。还没等我喘过气来，迎面屋里走出一个40多岁的女人，打扮得十分整齐。她一看见我这个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便两眼圆瞪，大声嚷道：“你是八路！上俺这里干啥，快走！八路……”她连声地朝外喊，越喊声越大。外边枪声紧急，敌人越靠越近。我满肚子气愤，说不出一句话来，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顺手搭着墙头一用力翻出了这座宅院。刚跳出大院，就见敌人正从前方不远处通过。眼前有一片松树畦子，恰好掩饰草绿色的军装，我便隐伏在那里。

看敌人已经全部通过，我又往前走。一位老大娘正坐在围沟沿上摘花生，摘完花生的秧子在身旁堆起了一个小垛。正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离我100多米的一片树林里，又出现了一股敌人。眼前的情况如何处理使我犹豫起来。老大娘向敌人那边看了一眼，低声向我叫道：“你过来。”眼里含着无限的关切、焦急。在这样的时刻，听到这样亲切的声音，心里说不尽的欣慰。我快步走到她眼前，还没等我说出什么，她把我往花生秧子垛边一推，顺手一拉，花生秧子便把我全身遮盖起来了。我怕老人家受了连累，挣扎着要往外出：“大娘大娘，这样不行。”她紧靠着我，挡住我的身体坐在地上：“你还上哪去？听话，别动。”说完继续摘花生。躲在垛里，为了防备万一，我用上衣遮蔽着手里的两把匣枪，枪口指着外面。大娘一直那么镇静地摘花生，她不会不知道自己担着多大危险，她只是从军衣上知道我是八路军战士，才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自己的子弟。紧靠着大娘在垛里，心中十分激动，我想：万一敌人找到这里，我要拼上自己的生命，也不能让大娘遭到任何危险。我推了推她：“大娘，你闪一闪，万一敌人来到，有我的枪挡着，好保护你能跑开。”她听了这话，倒把身体更紧地靠着我。停了停，大娘悄声说：“真到鬼子来到近前，我实在护不住你的时候，再拼你自己的。”听完这话，我险些落下泪来，只觉得浑身发烧，心里无限激动

和感谢，都想一口说给她听，可是说不出，也不能说。

过了约有半小时，大娘站起身来，接着就听见她说：“你出来吧。鬼子汉奸都过去了。”我出来之后，大娘仍是那样安静慈祥地对我说：“你快过河，西边就是武河。”看着大娘满头白发，我低下头来，心里多少话只说出一句：“大娘，我谢谢你。”大娘亲切地看着我，用手拍拍我身上的土，凝神地看了我一会儿，轻推了一下说道：“快走。”我一言不发地告别了大娘，浑身觉得都是力量，虽然四面都是敌人，但我清楚地看到沂河区仍然是我们的，仍然在人民手里。

### 三

在武河岸边一片荫柳林里，完全出乎我意料地又见到丁梦荪同志。我们简单地谈了下失散后的情况，他便决定过河到西边去找部队。

涉水过河，到了多福庄沟北沿，进入一片树林，除了高大的白杨摇晃着最后几片大叶子飒飒作响，树林里静悄悄的，未发现什么可疑情况。我们稍微放慢了脚步，借此恢复一下体力。树林外不时响着敌人的枪声，从哪条路走好，怎样可以躲开敌人的包围、追击，情况不明很难确定。正走着，一位三十六七岁农民打扮的人迎面走来，脸上洋溢着高兴的神情：“你是丁专员吗？”丁梦荪同志一听这话，便赶紧说：“你不要认错了人，我们是卖盐的。”那人紧接着说道：“我叫刘祯祥，是这村的职工会长。在临郯县团部受训的时候，我听过你的讲话。”这时我们有些相信，还有点怀疑。他见我们迟迟疑疑的样子，便又说：“赶紧到我家去。南边高尧还有敌人。”看他的言语行动，都像个诚直可靠的农民，我们便跟着他一起回了家。

刘大娘蓦然一见我们，开始有点惊慌，到看清我的军衣之后，就镇静下来，双手抓住丁梦荪同志和我，眼里泪汪汪地说：“亲人，你们可担惊吃苦了，快歇会儿，我给你们烧水去。”把我们安置在床上，她又打发刘祯祥媳妇到门外去监视着敌人的动静。刘大娘拿出所有的几个鸡蛋，倒干了小瓢里的白面，要给我们做豆腐卷吃。

我和丁梦荪同志坐在床上，看着眼前的情景，再看看这间破屋，一张用了几十年的床，已经陈旧得发黑，一挨就吱吱地发响。床上一床旧棉被，黑碎的棉絮一块一块地露在外面。丁梦荪同志和我对视了一下，各自明白了共同的心意。丁梦荪同志便说：“大娘不要做饭了，我们不饿。”大娘转过脸来看看他说：“这到什么时候了，还说这话。咱们的命都放在一起了，你们还多想什么呢。只要你们结结实实的，打走日本鬼子，咱就什么都有了。”说罢她便去烧水、做饭。刘祯祥同志一声不吭地蹲在那里烧水。

忽然刘祯祥媳妇从外面走进来，告诉我们说，鬼子、汉奸正在湖南崖抓人、抓小鸡。听了这个突然情况，刘祯祥立即将丁梦荪同志藏在破驴棚后面，又用干草挡上，随即又将我藏在干草垛下。直到近黄昏时，敌人才转移到别的村子去。刘祯祥把我们叫出来吃饭，一整天的奔波，到此时虽是口干舌苦，却一点不想吃东西，刘祯祥一个劲儿地劝我们吃饭，可是我们惦念起那些失散的同志，更是吃不下了。这时我想起了丁梦荪同志，又是外乡人，口音不对，在敌人重兵保卫中再转下去，很难保证他绝对安全，因此他应该过沂河到滨海区。丁梦荪同志则决定继续西去找部队。

天黑以后，我们出了刘祯祥家。规定了联络记号，让刘祯祥同志走在前面。我们顺着一条天然沟，奔涌岸以南方向走去。望平原上看，各个村庄都是一片火光，红色的火焰冲上乌黑的天空。顺风传来猪、狗、牛、羊嘶叫声，阵阵难闻的血腥气，隐隐听到房屋倒塌的声音，从日到夜，不知多少家庭在毁灭着。丁梦荪同志默默地看着四野，有时轻轻地叹息一下。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我是在这里长大的，这里每一棵树

我都对它有特殊感情，眼前的情况，我不忍看也不忍听，心里像火烧又像被人在撕裂着。

在沟里遇见了沂河支队通讯员小宋，我们一起走。

忽然又发现前面有两个人，我立刻告诉丁梦荪同志。他说：“大概又是我们自己人，这样深更半夜，敌人是不会出来的。”说这话间和那两个人对了面，仔细一看，带着大盖帽，手持步枪，却是两个汉奸。我刚要上前，就见其中一个家伙，一举手里的金钩枪，哗哗一声把子弹推上膛，枪口指着了丁梦荪同志的胸膛。我站在丁梦荪同志右边，一看情况不好，一步窜上去，左手猛抓住那只步枪枪筒，用力向上一举，就见一片火光在眼前一闪，“当”的一声，一颗子弹射向了天空。我随着用力一拉，右拳往上一挡，敌人手里的步枪顺势出手掉在地上。我双臂用力抱着敌人，想一下子把他摔倒，可这家伙拼命挣扎，几下子也没弄倒。这时另一个敌人撒腿就跑，刘祯祥是个老百姓没有经验，小宋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更不懂事，丁梦荪同志的眼睛这时大概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只得连声叫喊“快打”。我刚说完这句话，忽然失去知觉，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了……

#### 四

我试着把手臂往外一伸，看看现在能不能活动，谁知道却触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具死尸。想起来这大概是我拼命的那个家伙，被丁梦荪同志打死在这里。从死尸还未被敌人发觉弄走看来，我昏死过去的时间不久，也许这一夜没过去，那么丁梦荪同志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在地上又躺了会儿，定定神，平静下来喘息，我试着再站起来。既然没死，无论怎么困难也得找部队去。用力地刚迈出第一步，就觉得疼得钻心，低头看了看，大概是第一次摔倒就把鞋摔掉了，光脚踏在豆楂上。

天黑得辨别不清方向，摸摸索索地找到一条我们挖的交通沟，忍着疼痛，拖着两只满是鲜血的脚，顺沟向前走。本来该向西走，此时却糊糊涂涂地朝着涌泉、耿墩当中的方向走去。结果又走到涌泉西门外的松树林边，仔细一看，原来这是耿墩到涌泉的交通沟，不用再往前走，我也知道走错了路，就回头往西走。一路上见到黑影，就想招呼一声。快到耿墩时，发现前面有人，心里盼望着是自己人就好了。当对面喊



八路军实施反扫荡作战

问是谁的时候，我听声音是丁梦荪同志和刘祯祥同志，只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突然蠕动。我大声告诉他们：“我是刘景华。”一面说着一面往前走。他们大概为这个奇怪的情况弄糊涂了，停了一会儿没说什么。我赶紧用大声告诉他们：“我是刘景华，我没死。”到跟前一看，果然是丁梦荪同志。他们三个在“生”和“死”边缘上挣扎过来，又见到亲人，心里又高兴又辛酸，要哭流不下泪来，要说吐不出话来，身上却忽然像失掉了一切支持，一下子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十多分钟我用力睁大眼睛，还是一句话说不出。丁梦荪同志安慰我说：“景华，别难过了，咱们走，我们背你。”说着话他和刘祯祥同志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我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

走到耿墩河边时，正是午夜，一身单衣，又加上负伤之后流了许多血，河岸阵阵寒风一吹通体冰凉，禁不住身上阵阵发抖，没有一点力气地瘫软在他俩的身上，我看了看丁梦荪同志，身上冷得也在打寒战，他平时身体就十分衰弱，又经过这一昼夜的奔波，他得咬住牙才能架住我。看看眼前的河水，我要再让他俩把我架过去，那简直是故意地伤害他的身体了，我用全身的力气，声音却还是那么低弱地说：“丁专员你们走吧。”丁梦荪同志听这话，两眼紧盯着我，紧抓住我的手：“景华……”话没说完，他一下蹲在我的面前，拉着我的双手，让我伏在他的肩上，没等刘祯祥同志转过手来，他忽然一下子站起来。我挣扎着说：“首长，不，我不能……”我看不见他的脸，只听得他说：“都不要讲什么了，景华……走。”他一脚迈进了河里，河水在他脚下哗哗流过。河底全是碎石烂泥，他一步一踉跄，试探着步子往前挪动。我觉得他身子不时地摇晃，但他又坚决不让刘祯祥同志替他。溅起来的河水，落在我的光脚上，渗骨头得凉。走到河中间，丁梦荪同志猛一晃，险些栽倒，感觉得出他是吃力地支持着，才又恢复了平衡。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早已含在眼里的热泪掉在他身上。过河之后，他放下了我，吃力地喘着气。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看我平安无事地过了河，睁开大眼看他，他微笑地安慰我说道：“景华，再忍耐二三里路，到宋家庄找担架抬你。长征的时候比咱们苦得多。困难是暂时的。”说罢，他捂着自己的胃部急促地咳嗽起来。

到宋家庄以后，找到了几个民工抬着我。这时东方已经发亮，我们往西奔沟崖。走在路上，一轮火红的太阳又在东天上升起，到处听到敌人的冷枪声。

在沟崖又会合了很多熟悉的同志，这时部队也已经集合起了许多。

把我送到马家卫生所的第四天，分区司令员贺健同志从军区开完会赶了回来，在夏墩、卡湖、马家、三沟崖，将部队整理完毕。敌人的疯狂就要受到重重的打击，我军从农历八月二十五日起，展开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

# 老红军常万富 (下)

李 冰

## 五、巧遇一二九师战友，协打阳明堡机场

阳明堡机场位于山西省代县境内。原是阎锡山政府建的简易机场，后被日军占领，成为忻口战役中日军飞机轰炸我中国军队阵地的出发地，也是日寇补充弹药和油料的落脚点。由于是简易机场，日军占领才20多天，新建了防守设施。机场有200多守卫人员，配有轻重机枪60余挺，另外，附近的阳明堡镇日军驻有500多人，东北方的代县县城更是驻有大量日军，西南方的崞县也驻有日军。由此可见，日军对这个机场的安全与防卫是如何的重视。

机场共有24架飞机，白天增援忻口战役，轰炸我方阵地和村庄，对我阵地造成了很大威胁，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日军的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的技术均达不到夜航能力，因而晚上全部回机场宿营，国民党的忻口前沿阵地屡遭轰炸，于是第二战区总指挥卫立煌求助离忻口机场最近的八路军出击，打掉忻口机场。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在团长陈锡联带领下，奉命向山西省原平东北山区挺进，执行侧击南犯日军后方的任务，配合忻口战役。

部队接受命令到达指定地区后，发现代县、阳明堡、崞县等地驻有日军，并以阳明堡机场为前进机场，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忻口。第七六九团经侦察后，决定摧毁阳明堡机场。

为确保万无一失，陈锡联派出了另外三支部队进行打援，对附近来自代县、崞县（崞阳）、阳明堡镇的增援日军进行阻截。阳明堡镇的日军距离机场仅三公里，配有装甲车。

19日夜，常万富领着骑兵排的战士执行完任务，返回驻地途中，经过阳明堡时，刚好路遇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的两个连向阳明堡机场方向开进。就走上前问道：“同志，你们是哪部分的？黑灯瞎火的，你们在执行什么任务？”

“我们是一二九师七六九团的，奉徐向前师长之命，来炸日本人的机场和飞机，听说机场用铁丝网围着，不好打，同志，您是哪部分的？”

“我们是一一五师的，我们配合你们作战，等一会你们先向后退，我们用大马刀把铁丝网砍开。”

常万富的骑兵排与陈锡联派出的七六九团第三营两个连秘密接近机场，靠近机场的时候，果然有一道铁丝网拦住了去路。老常带领骑兵排的战士，用大马刀三下五除二把机场的铁丝网砍开了一个缺口。两个连的战士，一个连袭击日军警卫部队，另一个连奔向敌人的机群，常万富带领战士们杀得兴起，飞马齐冲向飞机，大刀向飞机砍去，但怎么也砍不动。一二九师的同志们喊道：“同志，这么大的铁家伙用刀是砍不坏的，飞机要用炸药炸才行，你们休息，让我们来吧！”骑兵战士们才知道，飞机是砍不烂的。战士们爬上机身，将炸药包、手榴弹等投进驾驶舱、或绑在机身上，然后迅速撤离，不一会，机群顿时爆炸起火。整个机场火光冲天，爆炸声此起彼伏。

敌人见有人袭击机场，进行疯狂反扑，常万富带着骑兵排的战士像下山的猛虎一样，个个挥舞着马刀，呐喊着向敌群冲去。战斗即将结束，鬼子已无反抗，随着常万富“同志们！让一二九师的战友们打扫战场吧。咱们撤，回师部还有任务”的一声令下，一一五师的马队呼啸而去。

经战后统计，这1个小时的激战，将日寇停在机场的24架飞机全部炸毁（常万富的回忆录中说：敌24架飞机炸毁了23架，有一架飞机带伤逃跑了。其实带伤的飞机起飞后在空中爆炸了，他并未看见，所以一直以为跑了一架）。此战歼灭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八路军仅伤亡30余人。此战，削弱了日军的空中突击力量，支援了国民党军的沂口战役。

## 六、血战陆房

林彪受伤以后不久回到延安养伤，一一五师有一段时间由罗荣桓代师长，后朱总司令和彭总报中央批准，任命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任代师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委员。

平型关战役，一一五师给了日寇沉重打击，打出了八路军和中国人的军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振奋了中华民族誓把日寇赶出中国的抗日决心。同时也让日本鬼子与一一五师结下了死仇。凶残的日本鬼子必欲吃掉一一五师而后快，调兵遣将，一心要与一一五师主力决战。

1938年12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为增强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令第一一五师进军山东。同月，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六八六团由晋西北出发，经豫东北进。1939年3月1日，一一五师东进山东，开辟山东根据地，初到山东时只有数千人，为轻装前进，师直机关及部分家属尚留在山西。于1939年3月初，到达山东省郯城、鄆城地区，首战樊坝，歼郯城伪保安团800余人。继而进入运河以东、泰山以西地区，同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津浦支队及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扩大与巩固了泰（山）西根据地。5月初，日军从泰安、肥城、东平、汶上、宁阳等17个城镇，调集日伪军8000余人，坦克、汽车百余辆，火炮百余门，由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指挥，分9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5月2至8日，日伪军先后“扫荡”东平、汶上地区，9日开始向肥城、宁阳间山区推进，10日各路日伪军继续实施向解放区腹地推进，紧缩包围圈。同日，第一一五师令第六八六团主力掩护机关、部队分路突围。当夜，除山东纵队第六支队顺利突围外，一一五师师部、第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共3000余人未能突出包围圈，被迫在陆房周围纵横各约10公里的山区，凭险据守，待机突围。

5月11日凌晨，日伪军借助大雾弥漫的掩护，以炮轰开路，开始了猛攻。至15



时，日伪200多人从东南山口逼近师部。企图一举端掉师部。在这危难时刻，常万富率领唯一守卫师部的骑兵排，挥舞战刀，在“冲呀！杀呀！”的震耳喊声中左冲右突，杀向敌阵。顿时把敌人进攻阵形打乱了，敌人开始溃退，我英勇的骑兵排几十名战士，拉成横排开始呐喊着追击逃敌，直追到安临车站。此时遇到了日军增援的骑兵，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冲跨他们，不怕死的跟我冲啊！”

常万富喊着挥刀冲去，战友们挥刀紧跟向前。敌骑兵退缩了，溃乱回窜。常万富亲自缴获了两挺机枪，而他的战友们却奇迹般地无一伤亡。

是夜，骑兵排又护送陈光等师部领导安全突围，陆房战役胜利结束，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一一五师依然战斗在抗日的战场，它让敌人丧胆，成为了抗日的脊梁，常万富因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受到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等师首长的嘉奖。

## 七、挨罗荣桓批评

一一五师初到山东时不足一万人，为轻装前进，师部后勤机关及部分家属尚留在山西。在鲁南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后，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命令常万富的骑兵排到山西将师部留守人员及部分家属接到山东。

因当时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刚生完孩子两三个月，因而陈光特嘱咐老常要给林月琴特殊照顾一下，老常到达山西，在接到师部的人后，遵照陈光代师长的指示，特为林月琴安排了一匹马。过同蒲路时，这是敌人最严密的封锁线，必须用布包好马蹄子，小孩子要母亲把奶头喂在孩子的嘴里，以免发出声响。当时孩子罗东进只有三个月，所以老常让战士为林月琴牵着马，以使林月琴专心照顾幼儿，以期顺利通过封锁线，这本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但到达山东后，却受到罗荣桓政委的严肃批评，“老常，你为什么让林月琴单独使用一匹马？你不应该让她搞特殊。这样影响不好，希望你以后注意。”

老常知道罗政委向来严于律己，尤其对家属要求严格，这件事要发生在别人身上，自己肯定受表扬，这是在照顾产后妇女啊！但用在林月琴身上就成了特殊化了。老常知道这很不公平，但分辩是没有用的。只好忍了，这时陈光代师长从门外进来，见政委在批评老常，就接过话说：“是我让老常照顾的，这如果是别的女同志刚生完孩子，我相信你还得把自己的马让她骑，自己的家属就不应该照顾吗！”

老常这才算解脱了。

## 八、和徐向前赛马

1940年12月，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在临费沂边联县青驼寺以北王家圈村创办，翌年1月1日正式开学，朱瑞、罗荣桓、李林、李竹如、肖华等参加开学典礼并讲话。此间共办六期，培养了近千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老常参加了第三期学习，结业后被时任党校副校长的陈明留校任党校管理员并兼支部委员。

对这项工作，起初老常很不情愿，认为自己是军事干部，打仗打习惯了，不想做后勤。但后来校领导下了死命令，非让他干不可，只得上任。

老常任管理员一年多的时间里，充分发挥任刘志丹部扩红队长时做基层工作筹粮筹款的经验，把党校的伙食管理的有声有色。所以，领导机关开会经常在党校吃饭。时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徐向前，因其爱人王婧当时是党校组织委员，时常来校，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建安等领导也是经常光临

党校。

有一次领导们开完会，在党校食堂吃完饭，徐向前饶有兴趣地提议说：“老常，在延安时，就知道你骑马骑得好，曾用两小时跑180里路取回电台，咱们今天比试比试，看谁跑得快！”听说首长要和老常赛马，所有参会的人都来情绪了，罗荣桓、萧华、黎玉、王建安、周纯全、陈明等首长全体附合，一齐参加。规定好，从王家圈党校后面的西岭小路作起点，终点站选在沂南的高湖。老常的兴致也上来了，说：“我让你们一杆地（相当一里路），你们跑出去一杆地后我再跑，咱们高湖见输赢。”

“通讯员，你看好，等我们跑过那棵大槐树才让他跑，不要让老常耍赖。”陈明吩咐通讯员。

就这样首长们的一骠人马狂奔而去，老常等通讯员喊跑以后，才策马驰去。

到了高湖还是老常赢了。徐向前说：“我们服了，老常真是名符其实的神骑手。”

## 九、要吃粮、找老常

1939年3月，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主力进入山东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时，不足一万人，到一年后的1940年，山东的抗战力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一五师所属部队、山东纵队部队等，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了五六万大军，还不包括众多分散的地方武装。

这里土地贫瘠，日本鬼子“扫荡”加上连年饥荒，人民的生活极其贫困。这么多的部队，吃饭成为头等大事，粮食就成了突出问题。罗荣桓在多次会上特别提出：“现在部队粮食是大问题，一定要有专人来抓才行。”陈明推荐老常主抓地方征粮工作。领导们全体同意，于是老常又兼任了部队的粮秣委员，常管理员又加了一个重要职务——常粮委。

老常接手抓粮工作后，充分利用他在陕北红军任扩红队长时积累的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开始了新角色。他把骑的大洋马换成小毛驴，以使自己成为人们眼中地地道道的生意人。

他广交朋友，认了无数山东“娘”和无数把兄弟。每个村选几个可靠的农户作为自己的堡垒户，把征来的粮食保存在这些铁杆抗日力量家中，使他们成为八路军的地下粮库，需要时取用方便。

1941年8月20日，在沂南县青驼寺战工会成立后，山东解放区实现了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在老常负责筹粮的四年间，面对敌人的频频扫荡、蚕食根据地，老常克服一切困难，共在沂蒙山区根据地建了24个粮站。这些粮站，平时隐藏在老百姓家里，部队何时用粮，老常就会就近取粮，为抗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一天下午，山东分局秘书长陈明，带着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人来找老常，陈明指着老常对黎玉说：“他是你老板。”意指老常是黎玉的老乡。其实黎玉是山西人，而老常则是陕西人，反正都是山的西边，在南方人看来就算是老乡吧。“你不是要粮吗？就找他吧！”陈明笑着对黎玉说。

黎玉非常着急地说：“我的好老乡，你真的有粮吗？快救救急。我的十几个粮秣员到哪里都要不出粮食来，你能帮忙吗？”

“你要多少粮？你们住了多少村？”

“十几个村子。”

老常笑了笑，从兜里拿出一叠二指宽五指长的小便条，在十几张便条上写上要粮数及村庄名，盖上老常的私章交给黎玉：

“现在，叫你的粮秣员去取粮吧！”

“老板，你不是开玩笑吧，二十六梯队的大公章都拿不到粮，你就给我这点小破条就能拿到粮？”

黎玉不相信这点小条能比他省政府的大印有用。

“你不相信，我就在这里等，你的粮秣员要拿不到粮，来找我！”

老常急了，这么不相信人，干脆拉着陈明和黎玉坐下来等粮秣员们取粮的结果。几个时辰下来，各部队粮秣员全来复命，果然都拿到了粮。“黎主席，我们不但拿到了粮，还要到了腌香椿。哎呀，都满足了。不起眼的小条还真管用！”“你的小纸条神了，还真管用！”黎玉拍着陕西老乡的肩感慨地说。

自此以后，在山东解放区传开了：要吃粮，找老常！而且在他的“粮库”里还要什么给什么。为了工作需要，老常又和许多家在本地的伪军及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拜把子，称兄道弟，为在敌占区筹粮筹款行方便。

对那些死心踏地的顽固亲日派，他毫不手软，找准机会，坚决铲除。每年的夏季和秋季，他就和敌人斗智斗勇，组织群众抢收成熟的庄稼，为八路军虎口夺粮。

## 十、智斗王大脚

1941年初，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年代。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每一场战斗下来都会有大量伤亡，然而由于八路军缺医少药，多少英雄的战士因无药而无谓的失去生命。有的失去了腿脚，失去了胳膊，失去了眼耳或生活能力，部队急需药品。看到部队减员，看到战士们因无药而致残，部队首长着急，陈光把常万富叫来：“老常，部队现在急需药品，你赶紧去想办法。”

“我想办法化装去敌占区买药，请首长给批点钱。”

“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只好你自己想办法，但任务必须完成，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负伤的战士们无药可医而变成残废啊！”

老常挠了挠头，硬着头皮答应着：“首长，我一定完成任务！”出得门来，老常可难为坏了。本来嘛，有钱到敌占区买药是件危险而又艰巨的任务，何况分文没有。怎么办呀？想来想去，了无头绪。还是找把兄弟、地方上的堡垒户、青驼北大欠庄的刘振太、刘振奎、刘振海及童端平他们商量吧。

晚上，老常把哥儿几个召集在一起商量。

他们七嘴八舌议论着，“咱们抢财主吧。”

“惊动了鬼子怎么办？”

“咱们拔一个炮楼吧。”老常都在摇头，均觉不妥。

忽听刘振太说：“每年的三月二十四日，青驼镇的三姑庙都有庙会，听说今年的庙会地主婆王大脚要去看戏，咱们绑了她，问她要钱，她家可有钱了，她在家又是说了算的人，绑了她准能拿到钱。”老常一听，觉得这办法行：“我看这办法行，你们再去仔细侦察一下，明晚还在此集合，仔细商量计划。”

第二天，哥儿几个又集中在一起，刘振奎说：“侦察清楚了，后天逢会时，王大脚会带着两个佣人去看戏，这就是下手的好机会。”经过周密计划后，他们决定后天行动。

阴历三月二十四日到了，青驼寺大庙会人山人海。尽管这几年闹日本鬼子，人心惶惶，但作为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庙会，一年只有一次，许多人还是来凑个热闹。平时非常冷清的青驼大街上又显得热闹起来，卖各种商品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拳卖艺的，都来集上表演表演，整个庙会真是热闹非凡，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王大脚花枝招展地带着两个女佣来看戏了。老常他们早早来到集市，盯着王大脚的一举一动，静等散场。

曲终戏散，王大脚带着女佣，心满意足地议论着戏文，扭动着腰肢向家走去。当走到老常们的埋伏圈时，哥儿几个突然冲出，把王大脚和两个女佣捉住，押到青驼北的桥底下、现在叫青驼北村的地方。

两个女佣吓得全身哆嗦，王大脚几乎成了一滩烂泥。老常对瘫坐在地上的王大脚说：“王大脚，你别怕，我们是打鬼子的八路军，绝不会伤害你，我们现在遇到点困难，想向你借100块大洋拿来买药，去挽救那些为打鬼子而负伤的抗日英雄。你平时欺压佃户，剥削长工，作恶多端，今天不和你清算，只要你借我100块大洋。我们就算你抗日了，我给你打欠条。”见王大脚只打哆嗦并不答应，老常火了，解开外衣扣子，撇开怀，露出一腰手榴弹和腰中别着的两把盒子炮：“告诉你，快叫佣人回去拿钱，别存侥幸心理，如果敢去告密，我就让你王大脚和鬼子一齐见阎王。”

王大脚真吓着了，慌忙颤声叫佣人：“杏花，快回去拿钱，给钥匙，到我钱匣子里去拿，记着谁都别告诉，连老爷都别说。”钱终于拿到了，事后哥儿几个还真有点后怕，毕竟桥下离鬼子炮楼只有200来米。

## 十一、教训日伪顽

老常为筹粮走遍了沂蒙山的村村庄庄，他机智勇敢、胆大心细，能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和各种人物。一次他在沂南青驼镇征粮时，有群众向他反映：每次青驼大集，都有当地的二狗子汉奸带着鬼子来乱抢东西，只要有好东西拿着就走，看见漂亮姑娘、媳妇就上前调戏。前几天，还把徐公店的两个姑娘抢到据点里去了，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搞得人心慌慌，大家都不敢去赶集了。

老常一听义愤填膺，决心要好好教训一下这群畜生，为民除害。“你们跟我说说鬼子抢集的规律，咱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人们提供了各种线索：“小集只有一个鬼子带着几个二狗子，鬼子抢，二狗子帮忙拿。遇上大集就会有两三个鬼子带着六七个二狗子。”“一般都是开集后半半个时辰就来了，抢完就走。”

老常听完人们的反映，心中已有计划，决心只身打大集！打他个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一个大集的日子，老常腰间插满手榴弹，两把王八盒子押满子弹，混在赶集的人群中。大概临近中午的时候，鬼子和二狗子们出来了，他们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寻觅着，看见中意的东西拿起来就走，群众敢怒不敢言。老常紧紧跟在鬼子身后，待两个鬼子抢了一只烧鸡、得意洋洋地啃着鸡腿时，老常掏出盒子炮，乘其不备，左右开弓，把正在啃鸡腿的两个鬼子击毙，然后向沙滩跑去，待其他的鬼子和二狗子反应过来，老常早已离开人群。伪军们边追边喊着：“抓活的，别让他跑了。”

老常一边跑，一边回头张望。见鬼子和二狗子们已离开了集市和人群，遂放慢脚步，从怀里掏出手榴弹，拧开盖，将环挂在小拇指上，猛一转身，就势将手榴弹扔了出去。第一颗刚爆炸，第二颗紧跟着爆炸，炸的鬼子和二狗子死的死，伤的伤，没有死的也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老常不慌不忙，镇静地随着混乱的人群混出了青驼街。

从此在沂水、蒙阴、费县一带，都流传着孤胆英雄、神枪手常万富的故事，各炮楼的日伪顽在一段时间里再也不敢轻易出炮楼了。

为了筹款筹粮，老常要经常和伪保长打交道。对死心踏地为日本鬼子服务的伪保长，老常就坚决斗争，对能争取的伪保长、伪村长们则采取恩威并施，使其就范，为我服务。



后排左二为  
常万富

常万富和沂水的一个伪村长纪玉美的友谊就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纪玉美家境殷实，有自己的商行、作坊，临沂、沂水都有他的生意，读过几年书，在村里也算是个头面人物。在周围村庄，也是个有影响的绅士。

为筹粮，老常以陕西客商身份住进了伪村长纪玉美家。纪玉美年轻时曾去过绥德，对陕北的风土人情也有一定的了解，老常和他越拉越热乎，在闲谈中纪玉美劝老常：“我们这里兵慌马乱的，还做什么生意，就算买到粮食、棉花，运到半路也得被抢了，兄弟，我看你还是回家吧！”

“不行啊，一家人还指着我吃饭呢，你还是多给我找点粮食和棉花吧。白布、蚊帐布也行。”

纪玉美在和老常的闲聊中对老常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不是为八路军服务的吧？于是趁老常睡觉时，纪玉美偷偷摸向老常的腰间，战争年代的军人，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此时老常假装翻了一个身，把纪玉美吓走了。枪是绝对不能暴露的。

第二天一早，纪玉美家来了两个鬼子，带着几个伪军找他办事，也就是要粮食，看见生人老常，顿时警觉起来，指着老常问纪玉美：“他是干什么的有？”

“这是我陕西来的朋友，良民的大大的。”听到日本人问，纪玉美急忙回答。鬼子盯着老常看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向纪玉美伪村长下达了送粮到炮楼的任务后走了。

鬼子走后，纪玉美擦着汗回头看老常，只见他却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很是奇怪，“唉！你怎么不害怕呀？”老常敞开怀，亮出了两把盒子炮：“有这个，我怕什么？”纪玉美这下可吓坏了，“原来你真是八路爷呀。”

经过老常对纪玉美的教育与震慑，几天相处下来两人竟成了好朋友。纪玉美亦从伪村长进而成了两面村长，再后来成了白皮红心的革命者，帮了老常不少忙。

在抗日战争中，老常类似的事情说也说不完。

# 临、郯、费、峯四县 边联抗日政权的创建和发展 (下)

赵 炯

## 三、在日、伪、顽的夹击中巩固发展 ——四县边联的战斗历程

四县边联是抗战的产物，是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抗日民主政权，所以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同日伪顽的战斗。边联人民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硬是在炮火和拼杀中奋战了八年。

### (一) 与日伪势力的斗争

1938年5月，刚刚成立的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经过短期训练后，便投入对日作战，在邹坞伏击掉队日军，首战告捷，缴获了部分武装弹药，装备了自己，鼓舞了群众。

1938年9月，义勇队改称“山东省第三区保安司令部直辖第四团”后，便会同张里元的卢团、何团的一个营和边联直辖一营一连，在临（沂）枣（庄）公路中段胭脂山伏击日军。上午九时许，日军五六百人，分乘六七十辆汽车，由西南向临沂方向急驰。战前约定由卢团发出攻击信号，并统一指挥战斗，此时，埋伏在路北的卢团，见敌人众多，便一枪未放，亦未向路南埋伏的友军发出撤退信号，就仓惶逃跑了，埋伏在路南的边联直辖一营一连的宋荣文连长眼见敌人快过完了，仍不见卢团动静，急不可耐，遂发起攻击，激战两小时，毙敌六七十人，因未能及时撤出战场，遭敌援军反击，我军也付出重大代价，牺牲连长宋荣文以下60多人，全连生还者仅五六人，张里元的何团也阵亡四五十

人。战斗结束后，边联军民在北小寺村，为烈士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当场即有五六十名青年参军，一支60多人的连队立时又恢复起来。

日军在占领中心城镇和交通要道后，开始向山区延伸。1938年10月，在30多名日军的掩护下，一支60多人的伪军侵占了边联根据地的行政中心车辆村，并安下了据点，在边联根据地中心楔下了一颗钉子。拔除这颗钉子，就成了边联军民的当务之急。车辆据点深沟高垒，为了避免牺牲，减少破坏，就采取了长期围困，迫敌撤退的战术。敌人曾六次向米山子阵地进攻，均未得逞。临沂敌人也曾分两路来攻，企图解车辆之围，遭到了边联军民在米山子和大炉两地的迎头痛击。万春圃主动要求承担阻击任务，掩护领导机关转移。战斗中，万春圃的次子，年仅19岁的连指导员万国英勇牺牲，排长刘云现身负重伤，全体指战员都为为之悲痛。在这关键时刻，万春圃立即赶到队伍前面高声喊道：“国英是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死的。他死的光荣，有什么可悲的呢！要打鬼子，就得做好牺牲的准备，在这一点上，国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钢铁般的语言，发自烈士父亲之口，句句震动人心，广大指战员立即把万般仇恨集中到枪口上，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1939年1月，被困无奈的伪军终于在卞庄敌人的接应下仓惶逃走，40多天的车辆围困战胜利结束。

1940年4月14日，日寇集中第三十二师团、二十一师团、独立第六、第十混成旅团各一部，共8000多人，分成十几路，分别由邹、滕、峰、费、临各县据点同时出动，向以大炉为中心的四县边联根据地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和梳篦扫荡，在梁邱、堰头二处设立兵站，其势汹汹，大有鲸吞整个鲁南根据地之势。我根据地军民在一一五师党委和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在罗荣桓政委的亲自指挥下，灵活运用翻边战术，以少量兵力牵制敌人，罗政委率师部和部分主力跳到四县边联的边沿区青山套一



图为1939年2月，鲁南特委在大炉开会时留影。前排右一为邾临费峰四县边联县委书记邱励。

带，使敌人扑空，部队毫无损失。敌人扫荡后在根据地安下了很多据点，在日顽夹击下，根据地大片落入敌、顽之手。一时反共事件频发。

在敌人拼命蚕食下，到1942年底，整个鲁南区日伪安下了441处据点，平均每12个村庄即有一处。边区县东南基本区只剩下十几个村庄，形成“东白山，西白山；漫溪、银厂、宝山前；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一枪打透根据地”的局面。敌人以梁邱为中心，先后打通了费县、埭阳及邹东、城前等地的几条公路，根据地被分割成互不相连的五小块。

1943年4月，王麓水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区党委和边联县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狠抓了整风、精兵简政、双减和军事斗争，根据地又在不断扩大。五六月间，鲁南军区在天宝山全歼伪九十二军，一部分伪军被包围在白山。荣子恒率其第十军主力800多人，迫击炮一门、手炮四门、重机枪二挺，轻机枪30挺，来解白山之围。下午一时边联武装将荣部包围在陡沟庄，经三小时肉搏战，毙敌150余，伤敌100余，俘其作战参谋王毅以下160余人，缴获甚多。战斗中边联人民冒着炮火抢救伤员，慰劳部队。战后，群众集资建了“陡沟庄战斗纪念碑”。其碑文曰：“除暴安民，军人之天职；歌功颂德，庶民之感戴。然自古国家养兵殊多，其食民害民，反击自向者，百世从出！确能为国舍身，为民流血者，无比于今日之八路军。”

除了正面作战之外，边联县专门成立对敌工作站，开展对敌伪的政治工作，教育伪军政人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少作恶，争取立功反正，给自己留条后路。对那些为非作歹，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边联敌工人员采取了坚决严惩、杀一儆百的措施。如对伪临沂县日本顾问川本定雄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武装特务解洪太、蒋中一等。

解洪太是川本定雄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经常窜到卞庄、贾庄一带活动，还派人潜入根据地内刺探情报，直接影响我党由滨海根据地通过微山湖赴延安的交通安全。鲁南军区、边联县委决定将其除掉，由军区二科、公安局、敌工站共同执行。经过详细研究和周密部署，于1941年农历十一月初九，在贾庄集上将其击毙。除掉解洪太后，敌特有所收敛，但蒋中一仍很猖獗。

蒋中一，又名蒋春之，原是我鲁南行署行政科的科员，后携驳克枪一支、钱款一宗，叛投日军川本手下，充当武装特务。由于他原是我方工作人员，认识鲁南地区一些军政领导干部，也了解我党政军机关的不少情况，就带领一伙武装特务，像疯狗一样，四处寻找我地下工作人员，并经常到边联县的向城、宋村、梧桐村一带刺探情报，寻找关系搞策反活动，有时还在临枣公路上设伏，伺机扑杀我过往人员。因此，鲁南军区、边联县委指示敌工站坚决除掉蒋中一。经过调查研究，得知蒋中一在梧桐村找了个小老婆，定于农历八月十五迎娶，他必定要在头天的向城集上置办嫁妆和宴席用品。县委在黎丘开会部署，由公安局和敌工站执行。果然蒋中一一早就到了集上，转了一圈后，便同一伪乡长到饭馆去喝酒，几个特务也陪着猜拳行令。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之际，我两个队员一个箭步上去，“当！当！”两枪，蒋中一应声倒地而亡，同时喝令其他特务就地躺下不准动。队员们迅即离去。当夜在向城南门外贴出布告，历数其罪行和县委的判决，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 （二）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边联武装一成立，立即引起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1938年5月，就在义勇总队同日军作战时，自称“华北游击第七纵队”的顽军马卫民部乘机逼进，并将义勇总队到各村催征给养的胡成祥等4人包围缴械，总队几经交涉无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消灭马部为民除害。经过一夜激战，将该部消灭，马为民本人亦被俘获。

在马部被歼后，地方顽固派更加仇恨和恐慌，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以打着“游击第七纵队”牌子的地主武装申宪武部为首，勾结东江地主武装刘广田部，策划



了一个消灭我义勇总队的阴谋。他们纠集了2000多人，企图对义勇队实施包围。苏鲁豫皖特委通过统战关系，从峰县士绅崔遽庵处获悉了全部计划，立即研究对策。一是迅速集结特委领导的部队，准备打仗。二是联络同我有统战关系的部队，争取支援或中立。三是派王见欣、李韶九去泰莱山区请山东人民抗日第四支队支援。由于我军集结迅速，在特委军事指挥童陆生的指挥下，经过两昼夜的激战，占领了羊庄、北塘、庄里等据点，朱锡海一个中队投诚，击溃了申宪武部2000多人，攻占了申宪武的老巢冯卯。申宪武只带少数人落荒而逃。我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总队政委何一萍英勇牺牲，年仅25岁。接着在四支队的支援下复攻东江刘广田部，由于刘据寨顽抗，数日未克。由于攻克冯卯后扣押了部分土豪劣绅，原与我有统战关系的地主武装发生恐慌，态度转变，与申宪武沆瀣一气，勾结国民党梁继璐部，向我进逼。省委书记郭洪涛分析形势，认为再战不利，为保存实力，决定北撤，但并未对义勇队和地方党委的活动作任何部署，便率省委机关和四支队单独北撤。走后，才书面通知义勇队自行决定行动方向。省委和四支队在北撤途中，由于脱离了地方党组织的支援和配合，遭地主武装袭击，进行了艰苦的“八里沟突围战”。幸亏成钧旅长见形势危急，光着膀子，手持大刀，带领敢死队拼死杀出一条血路，才摆脱险境。义勇队在转移中，也遭申部袭击，二大队教导员渠玉柏等人英勇牺牲。这是边联根据地在创建中一次较大的挫折。

1939年12月28日，在五十一军的唆使下，乘四县边联农救会直属中队和自卫团在费县官里庄召开成立大会之机，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他是五十七军二师师长霍守义的外甥）以县长身份前往“训话”为名，率队包围会场。然后以欺骗手法，让自卫队员放下武装，后退站立，而他的部队便乘机用机枪向自卫队员扫射，当场打死6人，打伤21人，抢走步枪300多支，制造了震惊一时的“官里庄惨案”，事发后，边联办事处根据罗荣桓政委的指示，组织自卫团，各社会团体代表及死难者家属到一一二师请愿，要求抚恤死伤者家属，赔偿一切损失，并把罪魁祸首交边联人民审判。同时，各工作区也都召开声讨李长胜大会，起初霍守义还假惺惺地答应支持群众，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边联县委办的《战斗报》马上把他的话给刊登出来，这无疑给李长胜一个沉重打击，霍守义见对己不利，以后再也不敢露面，就避而不见，或派人敷衍。《战斗报》又把他这一套登了出来，弄得霍守义十分狼狈。这时罗政委又指示说：“你们有农民自卫团嘛！以群众武装去打杀人犯李长胜，这是理直气壮的事。”于是四县边联抽调了24个自卫团的基干队，组织各界民众3000多人，成立了以农救会长宋逸安为总指挥、于化琪为政委的讨李前敌委员会，兵分五路，准备向李长胜盘踞的崮口进攻。正在这时，张里元收编的土匪武装保安第五旅王学礼部三个营及旅部进到车辆以南，深入边联根据地的腹地。前委考虑到此时发起对李长胜的攻击会腹背受敌，更重要的是王学礼是老土匪，他的部队在各村住下，群众要遭殃，也就不安心打李长胜了，便一面下令五路军立即调往车辆以南，拂晓前进入各山头埋伏，一面报告罗政委和地委书记宋子成。

第二天早晨，王学礼部进入伏击圈后，自卫团两面夹击，激战半日，除王学礼带十几个骑兵逃脱外，600多人全部被歼。缴获机枪四挺、步枪几百支、战马三四匹，大获全胜。根据罗政委指示，休整几天后，按原计划包围崮口。经三天战斗，除李长胜乘夜逃跑外，其余全歼。两次战斗胜利后，大大鼓舞了边联军民的斗志，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0年8月，雷雨口地主高子元、高至鲁，勾结南鲁城地主张荣华、刘庄刘胜春、太平庄孟昭敏等反动地主武装，在鲁城集上抓捕殴打我边联二大队战士数人，并公开扬言反共，同时策动边联二大队八中队叛变，把四五名连干部绑架到雷雨口向高子元献功，致使这几位干部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边区的“雷雨口事变”。事变发生

后，鲁南军区司令卞农立即派东进支队二大队一营前去处理。一营在营长曹庆贞、教导员李元龙，参谋长潘风举的带领下攻打刘家郭。边联支队配合包围雷雨口，半夜发起进攻，很快攻入高子元属顽抗的院内，将其全歼。

1941年4月25日拂晓，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二旅六八三团团团长张本枝纠集国民党五十七军三三四旅旅子恒部及地方顽固派王洪九、李子瀛、李以锦、梁继璐等部2000多人向边联县发起全面进攻，妄图彻底摧毁边联抗日根据地。县委书记邱励，县长狄井芑率机关人员和警卫排突到青山套与边联支队、县大队汇合。县委决定暂避敌锋芒，然后予以还击。县委率各单位及随队撤出的区乡干部连夜过临枣公路向沂河三军分区靠拢，并派人通知一、二区撤往苍山。顽固派占领边联县后大肆烧杀抢掠，仅在九女山下就活埋共产党员、抗日干部、革命群众77人。边联县委宣传部长马驰，二区区长邱玉端，马山乡长房学鲁等都壮烈牺牲，制造了震惊鲁南的“四二五事变”，同时还将边联支队司令万春圃年仅十余岁的女儿万国荣、儿子万国平掳去，对万春圃进行要挟。五十一军写信给万春圃说：“只要你能过来，最小也放你个团长，要不赶快过来，就抓你全家，烧你的房屋，扒你的祖坟。”万春圃接信后，哈哈大笑，在回信中他说：“我跟共产党走，是因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抗日。我是为了抗日，不是为当官，我和孩子抗日无罪，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事变发生后，边联县民众代表宋逸安、万国华等28人联名致电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强烈要求立即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为了反击日伪顽的联合进攻，恢复边联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调集教二旅四、五团，沂河支队、师教导大队及地方武装组成讨逆大军，由教二旅旅长曾国华任指挥，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铸任政委，于5月16日分东西两方面向侵占边联根据地中心车辋的顽军发起进攻。经一周激战，王洪九部遭沉重打击后溃逃，张本枝部败退，边联地区全部收复。同时也与内线配合，救出了万春圃的两个孩子。

7月24日晚，五十一军六八三团张本枝部与王洪九部联合，企图袭击驻在边联县埠阳、西白山的鲁南专署和鲁南军区，妄图一举摧毁鲁南军政领导机关。鲁南专署、鲁南军区、边联县党政机关闻讯后分别向抱犊山区转移。25日拂晓，当边联县机关人员到达该县西北部的上村时，遭到张本枝部的伏击。因众寡悬殊，虽奋力拼搏，仍损失严重，十多人伤亡，数十人被俘，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七二五事变”。不久，边联县委书记邱励到后方养病，在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10月25日下午，赵铸率区党委机关、党校及警卫连（仅3个班），移驻边联县银厂村。国民党五十一军六八三团团团长张本枝纠集地方顽固派王洪九等部1000余人，于27日凌晨3时许，突袭银厂村。警卫连发现时，敌已迫近，当即开枪抗击，机关人员随即向东突围。敌人已用机枪封锁了赵铸住宅的大门。赵铸同两名警卫员一名电报员，从南门突出，转向东突围。当发觉机密文件尚未带出时，他立即返回，将文件销毁。党的机密保住了，他自己却落入敌手。区委宣传科长蔡明等10余人被俘。赵铸被俘后，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曾派教二旅政委符竹庭到鲁南主持召开鲁南党、政、军领导人会议，研究了营救赵铸的措施及反击顽军及严惩凶手等问题。开始敌人并没弄清赵铸的身份，初审时赵铸自称姓王，在营部当文书。几天后蔡明叛变，供出赵铸的身份，敌人惊喜万分，张本枝亲自审问，施以酷刑。赵铸大义凛然，泰然自若：“我就是赵铸，中国共产党员，我是领导鲁南人民抗战的，抗战无罪！救国无罪！你们必须立即送我回去。”并慷慨陈词，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怒斥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残害共产党人的罪行。敌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不能动摇他的坚强意志。敌人伎穷，遂于11月13日夜，由敌团政治指导员于大川监刑，出动一个连的执法队，将赵铸活埋于九女山西隅。就义前，赵铸从容不迫，变刑场为讲坛，继续向押解他的士兵宣讲中

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顽军士兵认清形势，抗战到底。最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5岁。同时遇害的，还有边联县民主人士许善修等20余人，这就是震惊山东的“银厂惨案”。鲁南区党委于12月20日致信赵铸烈士的夫人李岩，信中指出：“赵铸同志的牺牲，在鲁南是不可比拟的损失，也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我们热爱赵铸同志唯以百倍振作和紧张的工作热情，来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

1943年春，鲁南区党委、鲁南行署决定并经上级批准，在纪念赵铸牺牲一周年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改边联县为赵铸县，1944年春，又在素有小泰山之称的鲁南名山峰山上修造了庄严雄伟的“银厂惨案纪念碑”和赵铸烈士墓，将赵铸烈士遗骨迁葬墓中。全县人民自动捐集铜钱80斤，精心铸造了赵铸烈士铜像一尊，安放在墓前。

1941年的“四二五事变”“七二五事变”“十·二七事变”，被称为边联县的三大事变。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四县边联”的行政区划和“边联县”的行政建制，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鲁南人民进行那场历时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创造出来的新生事物，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诞生的，它的出现，完全是抗日的需要，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历史，是当时边联人民同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记录，是用生命和鲜血铸造的丰碑，子孙万代会永远纪念它。它的全部已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彪炳千秋！

# 谢立全：《西行漫记》“小号手”

唐 蕾



“父亲生前从未对外提起过《西行漫记》中那个‘小号手’的故事，只是在给妈妈的信中，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他说‘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他一辈子都很低调，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亏欠着战斗中死去的战友。”儿子谢小朋回忆父亲谢立全时这样说道。

谢立全（1917—1973）原名谢立传，江西兴国樟木乡源坑村人。1929年参加红军，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连政治指导员，第三军团师政治部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战爆发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政治指导员、股长，抗大第三分校大队政治委员。后任广东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副指挥，中区纵队副司令员，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代理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海军学院第一副院长。1962—1969年任海军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 低调“号手” 不愿透露真实身份

“父亲为人很低调，我们小时候读军事院校子弟学校，同学相互比较父母军衔，比领章上有几颗豆。因为父亲只有一颗星，同学们告诉我那是小兵，我回家问父亲，他笑笑说‘我本来就是小兵’。”

低调地称自己是个“小兵”的谢立全，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十分著名的形象，这就是斯诺《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1979年版封面的“号手”形象。封面上，那个红旗下吹响军号的战士形象，随着书的发行深入人心。然而长久以来人们不知道“号手”正是谢立全。

1972年2月斯诺逝世。为了纪念他，当年第五期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了斯诺生前拍摄的部分照片，其中就包括这张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谢立全看见了这张照片，但是他一直没有提及，直到后来身患癌症，才冲洗了几张《抗战之声》，作为遗产留给子女们。

谢立全在给妻子的信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营长是何德全），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谢小鹏告诉记者：“当时斯诺打算拍一个号手的形象，却发现小号手面黄肌瘦、衣衫破旧，而父亲因为体格健壮、身挎手枪被一眼相中了，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他身上那套当时并不多见的新军装，这是他刚刚指挥了一场胜仗，上级给的奖品。于是父亲就被斯诺拉去摆了个pose。照片上父亲的号嘴是顶在唇下的，其实他并不会吹号。”

## “月光族”父亲资助战友遗属

“小时候，我们家是典型的‘月光族’。当时父母月工资加起来近500元，已经是高薪了。说来很不好意思，你看我们这唯一一张全家福。”谢立全的儿子谢小鹏指着黑白照片对记者说，“孩子们的裤子上都缀着补丁。和别人家一样，我们家也是衣服从老大往下传，到最小的弟弟那儿已经破旧得不行了。连父亲的司机都看不下去了，为我们抱不平，父亲也就一笑了之。”

“我们家的钱主要有两大支出：父亲尽量让长身体的孩子们吃饱吃好；其余的钱大部分被他定期接济阵亡战友遗属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对牺牲的战友始终有一种‘亏欠感’”。

在谢小鹏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念念不忘这么几件事：

当初从兴国老家参军时，父亲带出了170个青年。到战争结束时，大多数人都牺牲或者下落不明，最后只剩下两个，这让父亲感慨不已。

长征时，父亲是红三军团五师的青年科长，队伍行到川西高原时，父亲患痢疾掉队了，上级派了5个担架员来抬他，大家咬牙把他背出草地，最后5个人只剩下2个。

还有就是在广东打游击时，很多有文化的进步青年，包括华侨投身到父亲的部队。“像父亲后来长期资助的杨伯母，她的大儿子就是父亲手下的得力干将。杨伯母家原本十分富裕，但她毅然变卖家财支持革命，大儿子为国捐躯后又把其他孩子送到部队。上世纪60年代父亲抱病写作了《珠江怒潮》《流水疾风》两本回忆录，得到了3000元稿费。但除了给当舰艇兵的哥哥买了块上海表外，其余的钱全给了杨伯母。后来听父亲的秘书说，每次老战友来看望他，住招待所、请客吃饭的钱，都是父亲自己

掏，有时还要贴路费。有次没钱了，把一个陪伴他多年的德国莱卡照相机变卖了。”

### 周恩来亲授化装术成功捉敌

“父亲为人低调，打起仗可不含糊。在广东指挥抗日游击队时，化名陈教官，敌伪送绰号‘胡须陈’。父亲12岁参军，1930年4月彭德怀指挥红军第一次打长沙，他是小宣传员，拎着石灰桶，随军进城刷标语。人小又没有军装，没人注意到他。冲进城里发现了一名敌军官，他在背后大吼一声举起手来，那人丢下驳壳枪，头也不回就跑了。”

担任指挥员后，谢立全打仗前尽可能亲自侦察。在广东打游击时，因为是江西人，一开口就会露馅，便装成哑巴前往。说起化装这门技术，还是周恩来手把手教的。

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老人，还津津乐道游击队活捉汉奸“飞天鸭”的故事。“飞天鸭”郑东镇是三乡群众痛恨的“地头蛇”，勾结日军，上级决定消灭他。谢立全化装后多次前往侦察，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后来在擒拿郑东镇的战斗中，他率主力部队攻入郑宅，却不见郑本人，这时发现有人打开地窖逃跑，谢立全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十个手指戴满金戒指的人正是郑东镇，当场活捉了“飞天鸭”。

“父亲勇敢沉着，多次化险为夷。有时路遇日伪军盘查，他立马把左轮枪插进水稻田，混在农民中弯腰插秧，群众也自发地将他挡住。”

“其实就连斯诺照片中父亲的那套新军装，也是因为父亲指挥了一个漂亮仗，上级奖励的。当时国民党骑兵团偷袭红军西方野战军后方，俘去20多人，把准备做冬衣的棉花、布料一扫光。父亲所在的红一军团教导营决心夜间袭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战斗很成功，解救了同志，还俘获了400多匹战马，当时19岁的父亲一个人就牵了6匹马回来。战后罗荣桓主任动员将马匹上缴，成立了红军自己的骑兵团，奖励了父亲一套新军装。”



1950年与战友张富华（左一）家及弟谢立信（右一）合影，张富华与谢立信为谢立全带出的170名兴国战士中仅存的两位。

## 老百姓纷纷抓来大公鸡 要为“老陈”治眼病

在敌人面前他是可怕的“胡须陈”，在老百姓那儿，谢立全被亲切地叫做“老陈”。在广东打游击时，一次谢立全的眼球旁肿起来了，严重影响视力。当时部队无医无药，只好找民间秘方，听说用鸡血滴眼，或者用第一胎母乳可以消肿。当地群众把家里的大公鸡都抓来了；而在那种封建的时代，还真有位年轻妈妈自愿献乳，就这样很快治好了眼病。

“父亲做事讲原则，又很善于交朋友，包括敌对阵营和外国军人。1946年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由美国海军提供大型坦克登陆舰，运送东江纵队骨干北撤烟台，当时美方、中共与国民党方面成立了登舰三人协调小组，父亲是中共代表。最初担任组长的美军代表偏袒国民党，可是那位国军代表私生活不检点常误事，美方代表渐失好感。相比之下，办事严谨、计划周密的父亲，在人格上赢得了美方代表的认同，三方最后达成的协议采纳了父亲的提案，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设伏地区。上舰后美军要求航渡期间武器一律锁进船舱，遭父亲等人强烈反对，结果同意自卫武器随身携带，最终安全抵达。”

“4年后父亲出任华东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的第一大队由6艘美制“郡级”4000吨级登陆舰组成，就是他当年北撤时乘坐过的同型舰，这是由美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海军，最后又通过起义或缴获加入新中国海军。父亲不仅尊重旧海军人才，而且虚心向来华的苏联海军顾问求教，由坐船的变成管船的。”

## 志同道合的夫妇

“父亲虽然工作很忙，但对孩子的教育却一丝不苟。那时每个星期家里都要开家庭小组会，组长是家中的老阿姨，孩子们轮流汇报一周表现，犯错误的要写书面检讨。父亲还亲手为孩子们做了小板凳，每到周末播放广场电影时，我们就带着小板凳去看电影，不准坐在首长区。”

“我的父亲是自学成才，母亲则是名牌大学高材生，后来投身革命。说起来，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就是严于律己。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就主动搬出了将军楼。我结婚时没房，母亲说自己所在的南京体育学院，有名的运动员还住仓库呢，她怎么能去向组织上要房子呢！直到她去世时，单位的领导来吊唁，我才得知母亲在学校里，中午就在办公室书桌上小憩，晚上和女运动员睡在8人间的集体宿舍，小姑娘们怎么吵闹她也不介意。不同的出身，共同的道路，就是他俩的一生。”

# “忠孝两全” 宋鸣梧

仇同如

宋鸣梧，字泰侯，号泰斗，今兰陵县向城镇印王山村人，生于万历四年（1576年）九月十七日，病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初二。

不满20岁就得中秀才，24岁考取举人。子：宋之普、宋之韩。宋鸣梧曾历任行人司行人，吏科左给事中，尚宝司卿（正五品），左佥都御史（正四品），逝世后被崇祯皇帝追封为正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恩准其“神牌”安放在“乡贤祠”（官办的祠堂）中予以祭拜，并赐“玉祭一坛”和“清修介节”匾额一块，以褒扬里门。有诗集《琅琊集》《家传纂言》（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古文库，共四卷〈刻本〉）、《羲易集成》《四里纂言》《漫录纂言》《诸子》等文集，并在当时都曾刻版印刷，广泛流传于世，可惜现今大都失传。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七试不第的父亲宋日乾，在北京参加完由万历皇帝主持的“廷试”后，不幸突发眼疾病逝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的一个小旅馆里。宋鸣梧赤足千里将父亲接回后，守墓三年，后继母去世，他再次守墓三年。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继母的守孝期刚过不久，宋鸣梧便参加了当年由皇帝主持的“廷试”，并以优良的成绩得中进士。随后，他便被安排在刑部实习。1620年初，被授予行人司行人。

天启（熹宗）二年（1622年），宋鸣梧接受朝廷的命令，赴凉州执行平乱任务。

天启四年（1624年）春，凉州叛乱平息后，宋鸣梧被授“行人”衔。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在断然回绝了魏忠贤等人的拉拢和腐蚀后，宋鸣梧回到了自己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沂州府。

天启八年（1628年）春，宋鸣梧在休假长达两年多之后，回





到了京城。当他听说了杨涟、缪昌期和左光斗的悲惨遭遇后，失声痛哭，义愤填膺，当即决定上书弹劾。在宋鸣梧对魏忠贤一伙的斑斑劣迹，当庭慷慨陈词和执意上奏时，气得天启皇帝怒不可遏，顺手抓起龙案上的御砚便向其砸去，但侥幸竟被其接住。随后，不久便被魏忠贤一伙以主持乡试为名，将其派往万里之遥的贵州。并在乡试结束后的回京途中，又直接勒令其回乡休养，伺机予以处治。

天启八年（1628年）的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懋德殿病逝后，思宗朱由检（崇祯）在皇极殿即位。宋鸣梧在朋友的推荐下，也同一大批遭魏忠贤一伙迫害，而被削职和流放的官员一起被召回，并由行人司行人改任兵科给事中，诰封征士郎，不久又被提拔为兵垣（都给事中）一职，并在对魏忠贤一党的“彻底清查”中，专门负责魏忠贤家产的清查和处理事务。因其在查抄中，清正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崇祯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于奉天（今沈阳）称帝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怀着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南侵。作为守城的统领，宋鸣梧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首先与镇远侯顾肇迹并肩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号召将士们严把死守德胜门。战斗中，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间歇时，他运筹帷幄，及时向朝廷建言献策，并紧急制定了攻守防御的“十项策略”，敬献崇祯皇帝。崇祯极为重视，先后两次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宋鸣梧的守御方略，并与内阁大学士何吾鲁，翰林侍读姚希孟、丁进、文震孟等，专门进行商讨和研究，随后予以采纳和实施，战事结束后被加奖服俸一级。随后，便被派往安徽持节封藩，回后再次被升为吏科左给事中和独掌本科大印的都给事中。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针对当时内忧外患、清军不断侵袭和军队人心不稳的状况，宋鸣梧被派往内阁首辅大臣周延儒的军队中做监军，协助周延儒整顿军纪，鼓舞士气，以御外患。来到军队后，他首先组织将士们，利用关外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不断在山间峰口派兵设伏，连连打得来犯清兵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通过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宋鸣梧带领明军有力地打击了清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但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他慢慢地发现周延儒这个颇受崇祯皇帝恩宠的朝廷重臣，竟然也是一个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并与大清关系暧昧的奸滑之徒。他一时痛心疾首，伤心万分，当即决定密奏朝廷，予以弹劾。但不知怎么，竟被周延儒察觉。气急败坏的周延儒暴跳如雷，当即指使手下人反咬一口，并利用朝廷内外的死党和手中的权利，无中生有地对宋鸣梧进行栽赃和责难。崇祯也一时难分是非，面对重权在握的周延儒，为了顾全大局，只有一纸诏令将宋鸣梧贬为河南按察司照磨（文书一类的职务，从八品），调离京城。

崇祯六年（1633年）三月，当时与周延儒同样专权乱政的内阁次辅温体仁，为了争得首辅的权利，而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以周延儒“招权纳贿”和污蔑皇帝是“羲皇上”（伏羲氏以前的远古部落的一位平庸无能的领袖）为名，上书弹劾周延儒，并找出了众多的证人作证，致使周延儒无法抵赖，被迫提出辞职，十分狼狈地回到了他的老家——江苏宜兴。其后，在温体仁垮台八年后，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再次被起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赐自缢而死，并被锦衣卫用铁钉钉住脑门，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周延儒垮台两年后，已在南京升任尚宝司卿（正五品）的宋鸣梧被再次召回北京，于1635年3月，授予都察院协理院事和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同时被诰封为中顺大夫。

上任新职后，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实际状况，宋鸣梧先后提出了各种重塑朝廷威望和形象、彻底纠正和消除魏忠贤和周延儒之流的恶劣影响、尽快恢复经济和百姓

信心等一系列主张和措施，并严格掌握各种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清正廉洁和忠心报国的典型事例，彻底改变和纠正了百姓对朝廷的误解和认识。这在国家百废待兴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崇祯初年，无疑起到了不小的凝聚和稳定作用。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不遗余力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赞誉。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初二，宋鸣梧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北京府邸，享年只有60岁。

宋鸣梧逝世后，齐鲁大地的官员和绅士，无不敬仰他的品德和行为，纷纷联名上书，恳求朝廷予以旌表，并请求为其修庙祭祀。

当时，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同僚挚友，更无不对宋鸣梧的逝世深表痛惜，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表达自己对这位“忠孝两全”之士的敬仰和怀念。一时，众多的以吟咏和歌颂宋鸣梧的“忠孝两全”为题材的诗歌和文章，纷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部分后被收录在由时任吏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的费县人张四知写序的《咏忠孝录》一书中（已失传），有一部分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便有时任吏部考功郎中、后任吏部尚书的徐石麒；时任刑部右侍郎、后升左侍郎的张承诏；时任大理寺卿和南京工部右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的明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画家和诗人的甄淑；时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政论家和诗人，后在家乡上海抗清保家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侯峒曾；明代著名婉约词的代表人物、历任光禄寺少卿的俞彦和日照人曲靖府知府焦润生等人的诗词和文章。而俞彦的一首《余夙承公忘分之雅情见乎》五言诗，还被收录在《临沂县志·艺文》中。随后，宋鸣梧被崇祯皇帝追封为正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恩准其“神牌”安放在“乡贤祠”（官办的祠堂）中予以祭拜，并赐“玉祭一坛”和“清修介节”匾额一块，以褒扬里门。

之后不久，宋鸣梧的“神牌”和塑像，又被安放在临沂城中新建的“忠孝祠”中，与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和曾子并称“贤人”，同祠供奉。

崇祯七年（1634年）就任沂州太守的王崇显，也在其后所撰写的《改建忠孝祠升三贤记》（《沂州志·艺文》）中，对宋鸣梧作了很高的评价。

宋鸣梧知识渊博，特别是古文造诣颇深，他的古文作品，大都写得瑰丽多彩，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和同时代的文学家李攀龙齐名。他的作品多数以抒怀为主，而且感情真挚，由感而发，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现存《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的《琅琊文社序》《重修官桥记》《观察沈公平乱记》《张宋两氏新创大治义仓碑记》《琅琊生祠记》等，共有九篇之多，是临沂史志中古人作品被选编最多的人。

宋鸣梧的“忠孝”思想和非凡行为，对他的子孙和后代们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子孙中，不仅出现了儿子辈的宋之普同样为其赤足千里守孝三年、宋之韩为母（在台州躲避战乱时去逝）赤足千里的惊人之举，而孙子辈的宋念祖（宋之普长子，清直隶知州）、宋瞻祖、宋成立（清江苏宝应县令）、宋名立（清四川达州知州）等，也都是清正纯孝、名声不错的官吏；而且还有更晚辈的宋澍（清江南道、京畿道监察御史）、宋潢（清司洵擢郎中兼军需局钱法堂、现审处则例馆）、宋开勋（清河南鄆城县令）、宋献章（清扬州知府）等，也都各有千秋，有口皆碑，造福一方。其在《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均有记载。

# 我与战友刘知侠

李治亭



“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左）与《铁道游击队》小说作者刘知侠（右）

刘知侠同志是《铁道游击队》的作者，他写的这部书影响甚大。我与他相识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有着深厚的战地情谊。

我与军事文学前辈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同志都是同时代人。抗日战争中，刘白羽同志是东北革命战区战地记者，魏巍是晋察冀革命战区战地记者，王愿坚同志与我都是山东革命战区战地记者。我们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相识，后多次相聚，一起回忆交流战争年代一手拿枪、一手拿笔采写战士们英雄业绩的情景。我们之间由此建立起了深厚友谊。

刘知侠同志是闻名全国的作家，他的《铁道游击队》自1954年问世以来，至今已发行了近400万册。有精装本、普及本、节编本、缩写本等版本，还有英、俄、朝、法、日等将近10个国家的外文版。他的作品已经被历史所铭记，人民不会忘记，读者也不会忘记。

1985年，刘知侠与夫人刘真骅从省城迁居青岛。我当时任青岛警备区政委。我们两家住宅相距不到50米，朝夕可以相见。战友变成了挚友，晚年生活又增添了一份温馨。

我与刘知侠同志相识在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那时，我在泰山区宣传队工作，他刚从抗大文工团调到地方上参加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群众运动的试点工作，同时也当记者，写了不少反映这方面运动的报道，如《三千人的控诉》《钱包身》，还有《遥寄给沭河边的民兵英雄们》等文章，多在《大众日报》上发表。

这年秋天，在日寇“铁壁合围”“大扫荡”中，我军冲破敌人重重包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就在边作战边转移中，我们两个人所在的两个机关在鲁中沂水驻地相会了。那时，他已是知名的记者，他的不少报道在根据地流传甚广。随着“双减”群众运动的全面展开，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抗日群体更巩固了。记得那年秋末冬初，我们突围后一起在一个小山村张大娘家里住了两天。我们七八个人吃过张大娘家里的煎饼和凉地瓜，肚子饱了，身上也有劲了，决定继续突围找部队。于是跋山涉水，夜行军走了50多里路，天蒙蒙亮时才与部队会合了。

在两天的相处中，他给我们讲了许多沂蒙山区人民支援军队、救护伤员、掩护革命干部的感人英雄事迹。令人难忘的是《一碗鸡汤的故事》：几名伤员隐藏在一群众家里治疗。那时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唯一可以滋补的东西就是老百姓视为命根子的老母鸡。可是老百姓的鸡养得也不容易，要对付敌人的搜索，又要靠鸡蛋换点油盐。眼看着伤员流血的伤口、惨白的脸色，这家大娘还是狠狠心杀了鸡，熬了鸡汤送到伤员面前。这碗浓浓的鸡汤凝聚了老百姓的深情厚谊，汤上浮着一层黄油，溢着诱人的喷香味道。可是伤员谁也不肯喝，在大娘的再三恳求下，大家也是你推我让不肯先喝。后来，在大娘的“命令”下，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大娘含着深情的泪，伤员洋溢着感激的泪。一碗鸡汤饱含着根据地群众和伤员的血肉情谊。这也就是刘知侠同志在后来写的《红嫂》的原始素材。

六年后，我与他在淮海战场上又相会了。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元月10日胜利结束。我当时是八纵的战地记者，他是山东兵团《前线报》的特派记者。当时，我们几个纵队的记者，在兵团召开了一个写作座谈会，我印象特别深



刘知侠（后排左三）与山东军区文工团战友阮若珊（前排左二）李林（前排右一）等合影

的是他结合自己的战地采访实践，讲了他写《机枪射手老刁》和解放安徽灵璧时写的《突破口上》等战地报道的体会。他强调指出：火热的斗争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只有深入到实际的战斗生活中，才能写出真实而形象生动的指战员的勇敢和高尚的情操，才能写出战争时期真实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他还谈到写作的表现能力问题，他打比方说，写作要讲究技巧，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把人物写活了，作品也就成功了。

他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一直激励着我在横渡长江、解放上海、抗美援朝等的报道工作中去体验、实践，提高写作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和他又在济南相聚了。那时候，我在济南军区前卫报社任总编、社长，他长期担任山东省文联、省作协的领导工作。

“文革”前和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又多次见面，每次请他谈写作《铁道游击队》的经验时，他总是谦虚地说：是铁道游击队中的英雄人物感染了我。我敬爱这些杀敌英雄，他们在铁道上神出鬼没地和敌人战斗，创造了很多惊人的战斗事迹。真是打得敌伪胆寒，显示了党领导的游击队健儿们的神威。他们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和坚持抗战的自信心。为了采访他们，我两次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去微山湖采访，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战斗，才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在这个基础上，塑造了刘洪、芳林嫂、王强等形象，再现了敌后战场游击队员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1962年，知侠同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红嫂》，他对“红嫂”素材的掌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山根据地时就开始酝酿了。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红嫂”精神在沂蒙山老根据地又再次出现。他是弘扬“红嫂”精神的先驱和倡导者。

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接见革命现代京剧《红嫂》剧组时，对演员们说：《红嫂》这出戏是反映军民鱼水情的戏，演得很好，要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可以教育更多的人，做新时期的“红嫂”。后来这部由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红嫂》又移植成了芭蕾舞剧《沂蒙颂》。

刘知侠同志的作品留下来了，红嫂精神发扬光大了。一部好的作品，将为历史所铭记，深入人心，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 沂蒙大地一支笔 (五)

——惠玉昆先生的书法历程和业绩

刘瑞轩

## 热心中外文化交流

1989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临沂地区展览馆门前，彩旗舞春风，鲜花映笑脸，整齐的军乐队奏着欢快的迎宾曲。观众们熙熙攘攘，围拢来看热闹，只见大幅的红色会标上写着《日本雪心会书道展》。

偏僻的临沂小城怎么能引来外国的书法展呢？这是由临沂当代农民王羲之颜真卿书法研究会邀请来的。该会聘任了中国书协副主席、天津大学教授王学仲为名誉会长，而王学仲又是日本筑波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多次去日本讲学，和日本著名书法家、筑波大学教授今井凌雪关系很好。所以，当农民书画协会的主席彭云程请王学仲牵线搭桥邀请今井凌雪带领他的雪心会书道代表团来临访问，便顺利地达到了目的。但当代表团即将到来时，却出现一点波折。市政府知道此信息后有点紧张，便派人找



到彭云程，态度很生硬地问：“你们邀请日本书法代表团，为什么不跟政府打招呼，出了问题谁负责？”彭主席回答也不客气：“我们请客还要向您打招呼吗？你们请客也没跟我们说呀！我们办事自己负责，不用您操心。”话虽这么说，市政府还是在安保方面做了周密安排，使这次外事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惠玉昆先生从市书协得到通知后，便及时地于9点钟赶到展览馆来参观。他对此次展览很期待，听说日本有两三个现代派书法流派，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次展的是传统的书法，还是现代派的？

中国、日本、韩国都属东方文化圈内国家。中国书法是日本书法的根源，日本书法家常谦逊地称中国为“娘家”，尊奉中国书法是他们书法的母体。

早在西晋时期，《论语》和《千字文》就传入日本，汉字汉文进入日本，揭开了日本文化史的序幕。日本最早的史籍《日本书记》就是用古汉语写成的。随着汉字的输入，书写汉字的书法也产生了。到平安期（相当于我国五代时期），书法艺术出现第一个高峰，产生了号称“三笔”的大书法家，即空海、嵯峨天皇、桔逸势，其书作皆晋唐风貌，空海被称为“日本的王羲之”。到平安朝后期（相当于我国北宋时期），又出现了“三迹”的大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他们仍沿袭王羲之书风，又融入日本特色的抒情趣味，创出日本书体。

日本与书写汉字的古典书法并驾齐驱的是假名书法。假名是日本创制的自己的文字，它是借用中国汉字中的草书，略经变化而成的。假名最终成了日本国的文字。因为它与中国草书的密切的渊源关系，使日本人在写草书时格外得心应手。直到今天，草书在日本是最发达的书体。

这次雪心会来展的书法作品共180幅，布满了展览馆的各个展厅，可谓琳琅满目，多姿多彩。通过认真观赏，惠先生认识到，这里展出的既不是假名书法，也不是现代派书法，而是传统的汉字书法。从书写内容看，多为中国的古诗文；从字体看，能找到唐楷、北碑的基因，看到“二王”、宋四家行草的影子，也有人展示了篆、隶的风彩。但给中国观众视觉的最强刺激是书风与中国书家迥异，它雄强、狂傲、霸气逼人，带有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作品大都是六尺、八尺，篇幅宏大，气势夺人。从整幅布局看，密则不透气，疏又一片空白，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的感受是，有的如江河波涛翻滚，有的似狂风扫落叶……王世贞评价书法曾说“如怒蛟决石，渴骥奔泉”，用在日本书法上比较贴切。

临沂市书协顾问、老干部冯文镐写了《观日本雪心会书道展》一诗，道出了实情：

“雪心书道传沂蒙，翰海浩茫气势雄。  
狡兽骇奔魏晋体，虫蛇纷蕴周秦风。  
宗师古法有承继，立异标新见险峰。  
笔墨因缘文会友，友情长在岁寒松。”

当天下午，雪心会的日本书法家和临沂市的书法家齐聚临沂宾馆，在那里举行笔会和研讨会。在此，惠先生会见了代表团团长今井凌雪先生。

今井凌雪（1922—2019年），日本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毕业于立命馆大学，历任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教授。曾任日展参事，是书法团体“雪心会”的会长、西泠印社名誉会员、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他学书从唐代欧阳询入手，后转学魏碑，得其奇肆朴拙之致，再学赵孟頫，使之归于平和圆润。曾得日本文部大臣奖、日本艺术院奖。他在书法理论、教育方面也有成就，有学生上万人。他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对中日书法交流作出很大贡献。

惠先生通过翻译和今井凌雪交谈，从中了解到日本的现代派书法现状和所占的地

位。日本现代派书法主要有前卫派（墨象派）、少字数派等。前卫派，他们认为为了使书法成为真正的艺术，应该以脱离字帖为出发点，把文字从让人阅读这一含义中解放出来。他们不注重文字的含义，而是注重由线条美、线条组合产生的形体美以及节奏美等，他们把字写得像画，或者说似字非字，似画非画。因为和西方的抽象主义绘画相近，所以此派艺术受到欧美艺术界人士的看重。少字数派，他们的作品只写一两个字，要把字形放大，还有一整套的表现形式和技法，追求造型的完美，强调作品的现代感。因为其作品强调造型语言，富于空间构成魅力，也受到西方人的赞赏。除了以上派别外，还有现代诗文派也有一定影响。

最后，今井凌雪总结说，近60年来，日本书法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西方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的深入，出现了以上几种现代派，但古典传统派书法仍占主导地位，晋唐书法，尤其是王羲之书风被认定是书法的正脉。

通过这次和日本雪心会的书法交流，惠先生开阔了眼界，首先了解到书法的同行日本书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与中国书法母体的关系。其次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引来为我们书法的一个参照系，从一个新的立场和角度对中国书法进行思考，探讨中国书法未来发展的前景。今后应该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看，应该知己知彼，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辉煌，不能被盲目的狭隘情绪所蒙蔽，应以现代人的意识去迎接世界艺术高潮的到来，吸取外来书法的营养，使自己的书法艺术走向新的辉煌。

惠先生与韩国著名书法家金仁奎的书法交往最久，两人友谊最深厚。金仁奎是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人，系明治大学教授，韩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三元老之一），韩、中、日书艺交流协会副会长。1943年，为躲避日寇召少年飞行兵（敢死队），逃到中国东北的牡丹江福来屯隐居达三年之久。因为他与中国的结缘，所以他懂汉文，会写汉字，能说简单的中国话。自1990年中韩建交后，20次来到中国旅游，同时进行书法交流。

1995年6月，金仁奎受羲之书画报社、临沂华联集团邀请，在王羲之故居举行个人招待书法展。惠先生应邀和书协主席、画院院长皮之先及赵庆元、鲁民等人，参加了开幕式。对于这次展览的意义，皮之先的讲话说得很好：“这个展览是我们临沂



惠玉昆（前右）与  
韩国著名书法家金  
仁奎（前左）



市文艺界的一件大喜事，它标志着我们和韩国书画交流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中韩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韩国的书画也有优秀的传统，各个时代都有著名的书画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在韩国也受到高度的尊崇。近年来我们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今天我们又迎来了金仁奎先生的书法展览。金仁奎先生是韩国著名书法家、历史学家，有很高的文化学识，在书法上也有很高的造诣，真草隶篆功力都很深厚，非常精彩，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金仁奎先生致答辞，讲得也很精彩：“本人很早以前就有多次接触中国古典艺术文化之机会，并希望将勤练数十年的书法技艺，能得到贵国人士们的评价。碰巧临沂华联集团和羲之书法画报社邀请本人，来此展览作品，真是荣幸之至。临沂是书圣王羲之诞生之地，其后又出现好几位大书法家，因此其意义更为深远。本人借此于中国举行邀请展，今后将更致力书法研练。”

这次展览近30件作品，从书风看，和日本的书风大不相同，它更接近传统书法。因为金仁奎有“老夫子气”，也是字如其人吧。

同年9月，金仁奎又来临沂一次，为王羲之故居碑林题字一幅：“行住坐卧莲花台，处处无非极乐园”。后被刻石列入碑廊，成为永久的纪念。

通过两次相会和书法交流，金仁奎和惠先生惺惺相惜，互相尊重。金仁奎认为惠先生书法已达炉火纯青高度，惠先生也认为金书传统功力深厚。为了加深两国书家的友谊，9月24日，惠先生在六凤居酒楼招待金仁奎先生。作陪的有皮之先、赵庆元、高庆荣、鲁民等。饭后，惠先生书两幅字送金仁奎：对联“人间岁月闲难得，天下知交老更亲”，条幅“健康长寿”。

1997年冬，皮之先、马约等人访问韩国，金仁奎闻讯后，又托皮之先给惠老师捎来手套一副（韩国礼仪，兴送领带、手套）。为此，惠先生写《为韩国友人题诗》一首：

“隔海寄指匣，护手更暖心。  
君何多思念，情缘翰墨亲。”

# 东夷故乡寻踪 (五)

高雷

## 五、向国春秋

殷商王朝是已知中国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形态。最早的文献记载表明，在殷商后期中原大地的许多氏族部落已经完成了向城邦社会的过渡。至少在武丁时期已经出现数量众多的邑国。据董作宾在《卜辞中的亳与商》统计，见于甲骨卜辞中的邑国足有近1000个。许多邑国虽拘囿一城一地，但亦具有了国家的雏形。为了生存，这些邑国以殷商为盟主，结成了松散的军事联盟，不断地向周围扩张。



殷商作为领导者也是压迫者，他们把自己居住的范围划封为王畿，恩威并加在周围拉拢控制部分邑国承担着一系列拱卫王畿的职责，维护中央的共主地位，并加以封号。这种邑国被称之为封国。封国之外，那些亦友亦敌的国家，被称之为方国。李雪山在《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指出：商王朝通过作册、奠置和作邑等环节分封众多的封国诸侯，最多时期封国达285个，方国也有85个，合计达到370个之多。丁山在《殷商氏族方国志》考证：在周武王灭商过程中，征伐者有99国，臣服者有652国（《逸周书·世俘解》），总计751国，与《史记·周本纪》武王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会者800，基本一致。大多数封国在后来的历史潮流中被逐渐淘汰，湮没。到司马迁撰写春秋时期的历史时总结说：春秋200多年时间里共有36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发生大小战事480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450余次。见于史书的春秋诸侯国名超过120个，但比较重要的不过十几国。这里面就有一个东夷小国，起于殷商，终于春秋，顽强的存在于史籍几百年。它就是东方的向国。

殷商之时，向地被称之为向方，是东夷中的分支。“向”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已知它的方位在殷商王畿的东方。卜辞中有“田向”的记载，可见商代时向方是商王朝的田猎地，卜辞：“王其迺于向，亡灾。”商王经常出入向地。依照郭沫若若干支地名、同版地名、异版地名等系联方法，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向地与莒地为邻居，殷之时莒地被称之为莒夷、莒方，钟柏生考证：“莒方在商丘以东，淮河以北的地域。”临沂市费县曾出土一批商代带“莒”字铭文的青铜器，为莒方贵族所拥有，说明莒方在今天的费县一带。向地与莒方见于同版卜辞（《合集》33543），说明它们相距不远。同时向地又与孟地见于同版卜辞（《合集》29117、33544），郑杰祥认为：这个孟地与向、丧、官地相近，被称之为东孟，在今河南濮阳东南六七十里。杨树达认为：这个孟就是东方九夷之一的于夷。郭沫若认为孟地在河南省睢县一带。我们可以将孟方与莒方连线，那么向地应该就在这之间某个点上。同个方其直线距离最多也就100多公里，符合同版系联法距离的设定。这在文献资料中也得到了证明，宋郑樵《通志·氏族略》有：“向氏，祁姓，附庸之国。今沂州古向城是也。”元于钦《齐乘》有：“向城。沂水西南，《春秋隐二年》‘莒人入向’，《通志》云沂州有古向城……向城在莒县南，盖今沂州之向城镇是也。”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普查，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认可，文物普查发现，今临沂市兰陵县向城镇存有东周以前故城遗址。遗址位于向城镇向城村西，平面呈方形。边长500米，城墙大都湮灭，残存西南角片段，长11米，宽6米，高2米。文物普查时曾采集到半筒瓦、半瓦当、陶豆盘、灰陶纺轮等东周遗存。现被确认为“向邑故城”。这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向国中心。

星转斗移，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后，周武王建立西周，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分封天下。在商代向方的基础上重建了向国。如果说殷商时期的向地就在今天山东省兰陵县的向城镇一带，那么周时的向地有没有变化呢？晋杜预在《左传·宣公四年》“公伐莒，取向”处注释说：“向，莒邑。东海承县东南有向城。”承县，汉武帝时所建，在今山东枣庄市峄城区旧峄县西北一里。今人杨伯峻注：“向即隐二年‘莒人入向’之向，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本为国，莒人取之，今鲁又取之于莒。”宋代《太平寰宇记》说：“向城，春秋时向邑，故城在今莒县南七十五里。”又说：“夜头水一名向水，经汉棗城南入海。”“其棗盖在今（莒）县南七十里故向城。”古夜头水即发源于莒州东南八十里（今莒南县东北）之幞头山的寨子河，此处向城当为春秋之时的向国邑城。考古发现今天莒南县大店镇西约2公里的许家滩井与王家滩井之间确有一处春秋故城遗址。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高出周围地表约0.7米，东西长约3000米，南北宽约2500米，城垣早年被夷平，地表已无迹可寻，文化堆

积厚约1.20米，地下0.40米以下曾发现大量砖瓦残片，多属西周、春秋遗物，采集有周代夹砂灰陶绳纹陶罐、壶，泥质灰陶豆、孟、瓦当等残片和汉代泥质灰陶罐，壶残片及铜鏃斗、剑。

至于春秋之时向国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陈槃在《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中认为：“予疑向本小国寡民，数经迁徙，故经、传中向地亦数见，但其始封与其迁徙之迹，则书缺有间矣。”

向国的边界其北部与莒国接壤，王献唐在《山东古国考》中认为：初期，莒与向疆域毗连，后被莒国插入。西部同鲁国毗邻。

向方久处东夷，其族源有两种说法。《通志·氏族略》载：“向氏。祁姓，附庸之国。”据清人《姓氏考略》所载，帝尧伊祁氏之后有祁姓。此祁姓为尧之后，这是一种说法。先秦《世本》记载：“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广韵》记载：“神农居姜水，以为姓，其后为齐、甫、申、吕、纪、许、向、芮。”姜姓，为炎帝神农氏之后。神农氏有裔孙名向。《路史·后记》《古今姓氏书辩证》均认为：向为姜姓国。这是另一说。

《左传·隐公二年》传：“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说的是春秋时候莒国国君娶了向国国君的女儿，女子的名字叫向姜，向姜是一种尊号，是贵族身份标识。前一个字是国号，后一个字为父姓，标明同姓不婚，这说明东周之时向国国君确实姓姜。姜姓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为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原为游牧民族羌人，首批自北方进入山东原始部落之一，王献唐认为：炎族曰夷，姜姓，东夷土著。姜姓的地望大约在山东省青州市苏埠屯。向方姜姓为是。

至于向的爵位，因出土有殷商时期的亚向父戊爵，唐兰认为：亚与诸侯之称相似，金文亚型，是作器者自署爵称。李雪山在《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考证：“凡称亚者必是诸侯，并且又都曾在中央为官，是当时荣誉的标志。”

向国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颇为缺乏。主要保存在了《春秋》及“三传”之中，但足以说明向国当时的历史地位和面貌。

公元前721年（鲁隐公二年），《春秋》载：“夏五月，莒人入向。”《左传》解释：“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莒与向邻近，两国有姻亲关系；二是莒君夫人向姜不安分莒地生活，不辞而别，久居娘家不回；三是莒国派兵强行进入向国，带回了向姜。《公羊传》专门解释了“入”，是夺取后没有占有就撤走了。很有可能向国曾经行了抵抗，莒国军队撤退时连同王室残余人员一齐带走了。

公元前705年（鲁桓公七年），《左传》记载“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郑。”盟、向这两处城邑都在公元前712年“周郑易田”的名单上，是周桓王交换给郑庄公的城邑，但由于周桓王实际并不拥有这些地方的主权，拿别人的土地与郑国交换，造成了郑与盟、向之间的利害冲突，迫于压力，盟、向主动向郑国求和后又背弃了盟约，郑庄公为此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周桓王借机将盟、向之民迁到郑。留下了盟、向两座空城。至此向国彻底灭亡。

其后，《诗经·十月之交》中写道：“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憚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皇父：姓氏，周幽王时的卿士，总管王朝政事，为百官之长。孔圣：很聪明。三有事：三有司，指三卿。亶：信，确实。侯：助词，维。憚：愿意，肯。徂：到，去。“以居徂向”即“徂向以居”。从诗歌之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向地出现了行政上的空缺，有名无实，被周幽王分封给卿士皇父作了采邑。

公元前634年，（鲁僖公二十六年）《春秋》载：“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会莒子、卫宁速盟于向。”《左传》解释：“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会莒兹丕公、宁庄子盟于向，寻洮之盟也。”二十六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鲁僖公会见莒兹丕公、宁庄子，在向地结盟。重申前次在洮地的盟约。晋杜预注曰：“向，莒地。”此时向地归属了莒国。

公元前605年（鲁宣公四年），《春秋》载：“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谷梁传》解释：“及者，内为志焉尔。平，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犹可，取向甚矣。莒人辞不受治也。伐莒，义兵也。取向，非也，乘义而为利也。”这段话的意思是：鲁宣公四年春，周历正月，齐侯要跟莒国、邾国讲和，莒国不肯，于是鲁宣公攻打莒国，夺取了向邑。杨伯峻注：“向即隐二年‘莒人入向’之向，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本为国，莒人取之，今鲁又取之于莒。”

公元前556年（襄公十四年）《春秋》载：“春王正月，季孙宿、叔老会晋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蚤、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吴于向。”《左传》解释：“十四年春，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这段话的意思是：十四年春季，吴国到晋国报告战败情况，季孙宿，叔老和晋国的士匄、齐国人、宋国人等众多诸侯国与吴国在向邑会盟，共同商讨帮助吴国攻打楚国事宜。范宣子责备吴国不道德，以此拒绝了吴国人。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年），《春秋》载：“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杜预注曰：“向莒邑。莒数伐鲁，前年诸侯盟督扬以和解之故，二国复自共盟，结其好。”这段意思为：鲁国和莒国多次战争后于前554年两国在督扬（地名）的盟会讲和。本年度，鲁国孟庄子（仲孙速）到莒国的向地再次会见莒人并结盟。

顾炎武《日知录》定论：“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杜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也。先为国，后并于莒，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申论之：“向地见经传者凡六。隐二年，莒人入向；十一年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向；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僖二十六年，公会莒子、卫宁速盟于向；襄十一年传，诸侯会于北林，师于向；十四年，会吴于向……窃意莒所入之向，乃沂州之向。莒人入向而兼其地，而鲁复伐莒而取之，后遂为会盟所耳。”

向国的存在是历史事实，有它存的理由和价值，它也曾创造过辉煌，只不过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 诸葛恢嫁女

雪花

提及诸葛家族，人们会脱口而出“诸葛亮”。他如同耀眼的星光，在历史的夜空里熠熠生辉。反观他的同族兄弟，则在其光芒之下，有点黯然失色。

其实，三国至两晋，诸葛家族中出现了很多大人物。本文要说的就是诸葛亮堂弟的后代诸葛恢嫁女的故事。

诸葛恢有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老大嫁进了庾家（后改嫁至江家），老二嫁给了羊家，只剩小女，待字闺中。谢石（谢安的弟弟）仰慕诸葛小姐的芳容，便央求父亲为自己提亲。

有人登门提亲，本是件好事。可诸葛恢，丝毫不给对方面子：“诸葛与羊、邓两家，世代通婚，所以二女儿嫁给羊家，儿子娶了邓家的姑娘。而江家呢，是我照顾他。庾家呢，又是他照顾我。现在只剩下最小的宝贝女儿，是不可能嫁到谢家的。”

诸葛恢为什么要这样说？因羊、邓、庾都是高门大户，而当时的谢家还未发达显贵（谢家在谢安走上政治舞台后才成为东晋豪门）。门不当户不对，女儿怎会嫁过去？

谢石受挫后，非但没放弃，反而抱定一个念头：非诸葛小姐不娶！也许是造化弄人，诸葛恢撂下那句狠话后，没过几年就去世。谢石又去提亲，终于抱得美人归。

王羲之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女子让谢石如此痴情？于是趁参加婚礼的机会，暗中观察诸葛小姐。礼乐响起，新娘子在众人的搀扶下莲步轻移、款款而来。只见她头戴镶金嵌银牡丹凤冠，身穿如意云纹锦缎曳地青白嫁衣，并饰以绣刻金银，走起路来腰间围裳处垂下的碧霞绢丝飘带，连同裙裾一起轻舞飞



扬，恍如身姿婀娜的仙女乘着一团祥云，从天宫飘忽而至。再细看那容貌，可谓绝色出尘，在凤冠霞帔的衬托下，越发雍容华贵、光彩夺目。

婚礼仪式繁琐而又隆重，不能有丝毫闪失。新娘子的一举一动，都恰到好处，既显庄重肃静又不失柔美典雅。

王羲之心里暗暗赞叹：这通身的气派，一看就是世族豪门里走出来的女儿，诸葛恢果然教女有方啊。想到这，禁不住脱口而出：“我嫁女儿时，若有这样的排场威仪，也就没啥遗憾了。”

这段故事被记载到《世说新语》里：“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彪。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衰儿婚。”及恢亡，遂婚。于是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犹有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王叹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

诸葛恢活着的时候，莫说不把谢家放在眼里，就是面对琅琊王氏，也不肯低头。有次，他和王导在席间相遇，兴许是喝多了，俩人竟争执起门第的高低来。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世说新语·排调》）

王家祖上就显贵。及至王导，南渡后扶持司马睿开创东晋，民间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家的地位达到巅峰。王导忍不住炫耀：“为什么大家不说葛、王，而说王、葛？分明就是我老王家排在前面吗！”

“比如说驴和马，人们提起时不说马驴，而说驴马，难道驴各方面就比马强吗？”诸葛恢毫不示弱，反唇相讥。

听诸葛恢的口吻，真是牛气冲天。那么，诸葛家族到底厉害在哪里，敢和顶级豪门王家较量？我们就从他的曾祖父诸葛玄（诸葛亮的叔父）说起。

东汉末年，诸葛玄任豫章太守，早年丧父的诸葛亮跟着叔父一起生活。后来诸葛亮去了蜀国，哥哥诸葛瑾效力东吴，堂弟诸葛诞则留在魏国，官至征东大将军、司空，对曹魏忠心耿耿。

诸葛诞与夏侯玄交情很好。夏侯玄被杀后，他也起兵讨伐司马昭，被灭族。

诸葛诞虽被杀，他的子女却侥幸活下来。女儿早已嫁给琅琊王司马佃，做了王妃（司马睿的祖母），儿子诸葛靓在东吴作人质，也逃过一劫。西晋灭东吴后，诸葛靓躲在王妃姐姐家。晋武帝司马炎念及诸葛靓曾是自己儿时的玩伴，想与其重叙旧情，并许以侍中之职。然诸葛靓难忘杀父之仇，坚决辞官回乡，终身不面向朝廷而坐。

诸葛靓不侍奉司马氏，将心思用在教育子女上。次子诸葛恢到弱冠之年，声名鹊



起，受到晋元帝重用，一路升至尚书令（宰相），诸葛家族又显昔日辉煌。想到家族中曾经群星闪耀，遍及魏、蜀、吴三地，且都执掌军政大权，功业非凡，诸葛恢怎肯在王导面前低头，更别提把谢家放在眼里。

再回头说说诸葛恢大女儿改嫁的事。此女嫁给了庾亮的儿子庾会。庾会在苏峻叛乱中被杀。诸葛小姐对丈夫情深意重，甘愿守寡，并发誓绝不改嫁。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彪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暮来，女哭誓弥甚，积日渐歇。江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江乃诈魔，良久不寤，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然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魔何与卿事？而烦见唤，既尔相关，那得不共语？”女嘿然而惭，情意遂笃。（《世说新语·假谲》）

想到女儿风华正茂，却要独守空房，在孤单寂寞中度过大半生。父亲不忍心，就暗地里寻找合适的人。

江思玄，是个不错的青年，人品好，有学问，在国子监当老师（相当于大学教授）。诸葛恢将女儿偷偷许配与他，怕女儿不从，就骗她说要搬家。搬到新居后，诸葛恢带着家人悄悄离开。女儿这才意识到上当了。

江思玄不只是一定要诸葛家女婿这个头衔，而是打心眼儿喜欢这个女子，想要得到对方的真心。见她哭哭啼啼，就默默地睡在另一张床上。

数月里，打量他并无冒犯之心，她慢慢地平静下来。江思玄见此，就使了一计，夜里假装梦魇，面部痛苦万分，嘴里呼吸急促。诸葛女连忙唤奴婢叫醒他。江思玄忽地从床上跃起，笑着说：“我是普通人，梦魇本不关你的事，你那么紧张，说明你心里有我。既如此，为何不理我呢？”

江思玄用耐心和智慧，让对方卸下坚强的防备，露出女性温柔的一面。这种聪明，有狡黠的成份，但怎能否认他对她的一番良苦用心呢？

再来提庾亮。女儿改嫁前，诸葛恢专门写信询问亲家公的意见。庾亮的回复让人动容。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世说新语·伤逝》）

“你女儿还年轻，改嫁是应该的。可我却常常怀念自己的儿子，仿佛他的离去只是昨日的事情”。庾亮内心有点小纠结，既为儿媳的未来考虑，但念及过往，想起一家人在一起的天伦之乐，悲伤就禁不住袭上心头。所以又额外地添了一句：感念亡儿，若在出没。

两位父亲，一个要改嫁女儿，写信征求亲家公的意见，另一个答应之余又禁不住伤感亡儿。所有行为，合情亦合礼法。虽然他们位列三公，身份尊贵，但作为父亲，有和常人一样的心情，面对子女的婚姻，其开明的态度和作法让人温暖而又感动。

翻阅整部《世说新语》，诸葛小姐改嫁的记载，字里行间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堪称最温情的一幕。

作者用笔极简，却意义颇丰，回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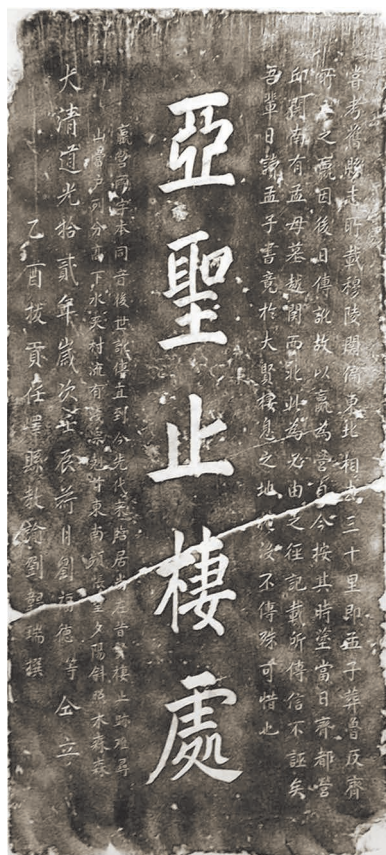
行文至此，越发觉得诸葛恢有趣，就连给女儿取名字，也令人称奇。大女儿叫诸葛文彪，小女儿叫诸葛文熊，花朵儿一般娇艳芬芳、水一样柔软清澈的女孩儿，不叫文美、文丽、文华、文秀、文清、文英，而是取了极为粗犷的文彪、文熊。历史上没有留下二女儿的名字，我猜会不会叫诸葛文龙或诸葛文豹呢？





# 沂水“孟母故里”考 (下)

刘海洲



## 关于孟母墓、祠在沂水的史籍记载

康熙十一年《沂水县志》卷一“古迹”部分里：“周孟母墓。在县东北六十里遵化乡。按邹县马鞍山有孟母墓。邹，鲁地，‘孟子自齐葬于鲁’即此处。”

县城东北60里的遵化乡，就是现今杨庄镇一带，孟母村距离县城正好30公里。清志里所说的这座“周孟母墓”，就是坐落在杨庄镇孟母村前、沭水之畔的这座孟母墓。孟母墓及墓前的孟母祠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一直到1946年孟母祠才被拆除；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巨大的孟母墓才被掘平，孟母墓、祠原址现在是一片苹果园。清道光七年编纂的《沂水县志》有关孟母墓的记载：“山南为葫芦岭：县东北六十里，岭南北三十余里，南麓小山突起，青石罗列，为马鞍山，孟母墓在焉。”

邹城有孟母墓，而沂水也有孟母墓，这已经是件怪事了。更为奇怪的是，邹城的孟母墓在马鞍山下，而沂水的孟母墓附近也有一座山叫马鞍山！只是邹城孟母墓在马鞍山东侧，沂水的孟母墓在马鞍山南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没有人能说的清楚了。

沂水的这座马鞍山就是明代沂水知县马之图在《新建孟母庙记》里所说的“峰峦竞翠，草木蒙茸，怪石林立，左右一水环抱”的那座山。此山独立于沭河冲积平原上，南部高而圆，西北部又略微隆起，中间稍凹陷，形似马鞍。此山是座土山，山体不是岩石构成的，但是在原来的山顶上，却有无数巨大的青石块散落着，远望这些巨石像山上开放的花朵一样，所以这座山也叫“石花山”。

道光《沂水县志》卷一“山川”之“水”部分：“沭水……又东南流，至孟母墓西，左合大岷水……”“沭水左岸之水惟大岷水为大，而入大岷之水箕水最远，……箕山水入之，抵孟母墓西入沭。”在介绍沂地河流时，对沂水、沭水、梓水这三条大的河流作了详细介绍。因为孟母墓就在沭河岸

边，孟母墓及祠，又是极为特殊的一个地标性参照物，所以，道光志在介绍沭河走向以及沭河左岸众多支流发源地、入沭地点时，两次提到了孟母墓。

孟母墓不仅仅在沭河东岸，距离沭河很近，而且沭河还环绕着孟母墓、祠接近一圈。沭河从东北流向西南，而流到孟母墓处时，因一座山岭（孟母村民称为南岭）的阻挡，折而向东北流去，在环绕了孟母墓大半圈以后，才向正南流去。

卷二“寺观”部分有两处：

1. “孟母祠：县北六十里，孟屋庄。”

“孟屋庄”即现在的孟母村。不知这个村名沿用了多少年，但从现存于赭丹山国营林场的寺院碑刻证明，早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就出现“孟母庄”这个名字了。据村里老人们说，村子以前叫“孟家屋子”。

孟母村从建村到现在，没有一家姓孟的。以前之所以叫孟屋庄或孟家屋子，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此村最早的村民是为看守孟母墓、祠而来的；另一种是这里有人居住后没有村名，因为附近有孟母祠，外人便于称呼这个新的无名村落，就以附近的孟母祠称呼为“孟家屋子”。

2. “二戴祠：嘉庆三年，知县张莅任，戴学潜呈请崇祀，因格碍难行，未准，仍劝修葺。捐给牲醴，如祀闵仲祠、孟母庙之仪，令礼房存卷。”

“二戴”指西汉经学家戴德和侄子戴圣。叔父戴德史称大戴，侄子戴圣史称小戴，合称为“二戴”。大戴和小戴都是汉宣帝的博士。戴德著有《大戴礼记》，戴圣著有《小戴礼记》，两部《礼记》都是传世经典。今本《礼记》即是《小戴礼记》，是戴圣对秦汉以前汉族礼仪著作加以辑录编纂而成，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小戴礼记》得到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出色注解而在唐代列为“经书”，成为此后士子的必读之书。

二戴原籍不是沂水，叔侄二人从梁地到东海之郯向大经学家后仓请教学习，经常往来齐鲁间，曾在沂水张庄（今属沂南县）一带“寓居”并授徒讲学。晚年因感怀当年“寓居”与开班讲学之地，于是返回沂水安度晚年，并终老葬于沂水，于是沂水有纪念他们的“二戴祠”。

从县志里这段记载看出：二戴虽然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但一直没有列入沂水县官方的祭祀名单，经多次呈请，才允许“捐给牲醴”，享受等同闵仲祠、孟母庙那样的待遇。由此可见，孟母庙千百年来一直享受着官方的祭祀，祭祀的规格标准都是有礼仪制度、有备案的。

卷八“冢墓”部分里：“孟母墓：县东北六十里遵化乡。按邹县马鞍山有孟母墓，此亦有之，未知孰是，或谓他孟母墓。”

此处记载文字，基本是承袭康熙版县志卷一“古迹”部分里对孟母墓的记述。先点出孟母墓的所在方位，然后又表示怀疑和不确定性。两帮编纂县志的官宦文人，都犯了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认为邹县的孟母墓是真的了，沂水的孟母墓一定是假的。他们既没有考察过本县孟母墓的真伪，更没有到邹县去考察那处孟母墓的真伪，就因为孟子的祖籍在邹县，孟子的坟墓在邹县，就想当然地认为孟母的墓也应在邹县。被封为“亚圣”的孟子，公元前289年去世后，一直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地在哪里，直到北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兖州知府孔道辅始寻访到了孟子的坟墓。从孟子去世到坟墓被发现，经过了漫长的1326年！孟母去世更早，坟墓发现时间更晚，经过了1300多年的沧桑巨变，谁能说得清哪个坟头是孟母的呢？现在邹城孟母林中最早的墓碑，是元代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刻立的，此时离孟母去世已经近1600年了。

除了清代《沂水县志》的记载外，清康熙十一年《临朐县志》在“古迹”部分里记载：“嬴：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按孟母冢在穆陵关南三十余里，

为鲁地。关北为齐地，羸离关稍偏东北三十里，乃反齐止宿之处。”《临朐县志》也明确记载孟母冢（墓）在穆陵关南三十里处。穆陵关是齐国的南大门，是齐长城上最大最重要的关隘，在现今沂水县马站镇关顶村。孟母墓在穆陵关稍偏东南30余华里，《临朐县志》的记载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 孟母祠遗留下来的石碑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沂水孟母墓前曾树立过多少通石碑，是个历史迷案了。但从清康熙年间邑人刘昕留下的《古碑记》来看，当时至少他见过五六通石碑，而他亲眼见过的石碑都是名人题写的，其中有“大学士”题书的，并且很明确地说是“邹孟母墓”。刘昕发现的孟母墓碑，是从土中挖掘出来的，仅从“东泉西窑及后土堆”就发现了五通。可见当时墓碑不仅很多，而且毁坏和丢失的墓碑也肯定不少。直到上世纪40年代，孟母祠内的石碑还有20多通，其中四通是很少见到的“四棱体”石碑，其顶面可坐四个人。

现在仅搜集到不明年代的完整石碑一通，但碑文已无法识别；明代沂水知县马之图的《新建孟母墓碑记》石碑残片4块，清代残碑一截。另外还有两块石刻。

“孟母碑”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通石碑了。碑高150厘米，宽76厘米，厚22厘米，石灰石质。额题“孟母碑”三字为阳刻。碑文为阴刻，字迹模糊难辨，行数、字数不详，时间不详，几乎找不出有用的信息。此碑原来在一户村民家，作为屋门口下面的“门枕石”使用了几十年，碑文被磨平了。清咸丰九年的残碑残存文字：“……考其制盖自明嘉靖初……易田供厥享祀其尊与敬……咸丰九年仲春吉……”此碑是2008年夏从孟母庙院内水井内挖出来的。仅凭残留的这些字猜测不出整个碑文的内容，好在留有立碑的时间——清咸丰九年。估计此碑是重修庙宇时立的。

刘昕的“古碑记”石刻是完整的，石刻长82厘米，宽29厘米，石灰石质。碑文竖排共27列，满列16字，字径1.5厘米。刻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这块石刻不是孟母祠中的石碑。但是这块石刻的内容非常重要，是记一通“古碑”的发现经过以及相关信息的。从文中看出，作者刘昕从亲眼看到某“大学士”所题书的“孟母之墓”“邹孟母之墓”等多通古碑。只可惜没有记下古碑的年代。刘昕此记时（康熙三十六年），邑人对沂水此处孟母墓的真伪还是争论不休：县令沈（凤）公命他将古碑加以保护而砌立，并让他董修理事，即负责重修庙宇，可见这一任沂水知县沈凤也和明代沂水知县马之图一样，是认定此处孟母墓为真实的。刘昕因为亲眼见过了大学士题书的“孟母之墓”“邹孟母墓”等多通古碑，自然对此墓的真伪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有是则知墓之既真，即朱江邨三元庙内正德年碑谓箕山有孟子堂，皆有稽矣，所关岂浅鲜哉？因记之，亦解后之好事者之惑云”。刘昕相信，有这些古碑作为确凿充分的证据，那些“好事者”（不相信此墓是真孟母墓的人）也该解除疑惑了！

邑人刘昕这篇《古碑记》里，在肯定沂水孟母墓真实的同时，又指出了一个新的证据：朱江邨（即今马站镇孔家朱江村，该村在孟母村北约7华里）中“三元庙”（“三元”也称“三官”）内有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重修庙宇时所刻“重建古迹三官灵坛记”碑，碑文中写到庙宇周边时有“东到杏山店，南到沐水，西至大官山路□亭，北有箕山孟子堂、玉林寺等。”这通明代正德年间的石碑现存立于村中“三官庙”原址处，大部分文字仍能辨读。“孟子堂”所在的箕山，在马站镇程家庄（在孔家朱江村北约10里）北，此山形如簸箕，敞口朝南，当地人叫“簸箕山”。笔者实地考察过“孟子堂”遗迹，附近村中老人介绍：山上原有一座庙，叫“三教堂”，不知始建于哪个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被毁坏，最后一个庙中的外地杨姓道士落户山下的程

家庄。庙宇旧址已无迹可寻，但农田地堰上垒有大量的古旧青砖和青瓦片。解放前的这座“三教堂”应是明代“孟子堂”的演变物无疑。

## 沂水孟母墓、祠的原貌及被毁过程

按照《孟子新志》（邹城市人民政府编）的说法，孟子“在齐丧母，归葬于鲁”的时间是公元前317年，那么，孟母的坟墓已经存在2300多年了，所以清代《沂水县志》定为“周孟母墓”。至于沂水孟母祠始建于何年，不得而知。

沂水县的孟母祠毁于1946年，孟母墓于1966年“文革”初期被掘平。而今虽然孟母庙、墓已荡然无存，但其实物的见证者尚大有人在，许多在庙里玩过、砸过石碑、平过坟墓的人，都能清晰地记得孟母墓、庙的一切情景。通过多次采访孟母村的老人，可以用文字还原民国时期的孟母墓、庙的真实面貌。

笔者自2008年5月始，一直业余研究沂水孟母墓、祠的真伪，多年来采访了几十位孟母村的老人及其他知情人士，积累了大量资料。凡是60多岁的孟母村人，都还记得那个庞大的孟母坟堆；80多岁的老人，都还记得孟母庙（当地百姓都习惯将“祠”称之为“庙”）的布局、房舍、石碑及看墓人家的情况。

村民张兰苓，出生于1942年，1958年始在本村做民办教师。他向笔者详细介绍了孟母庙的情况：孟母庙的位置在村东不远处沭水河边的一片平地里。庙有围墙，面积很大。前面是孟母祠，后面是后花园，坟墓在后花园里。祠内有多间正殿，另有三间东厢房和三间西厢房。大门楼子很高，大约三米多，比现在一般人家的门楼高得多。庙里有很多石碑，其中有四块是四面都有碑文的“四棱子”碑。这些石碑后来都不见了。坟墓是1966年扒的，用坟堆的土填了坟西边的一条水沟。

村民张吉夏，出生于1934年。他说：孟母庙是1946年被毁的。在毁坏之前，姓杨的“武举”一家一直住在庙里，杨家的后人杨金溪（音）前些年闯了关东，杨家在村里没有人了。当时庙里有20多块碑，庙院里还有一眼井，其中一块石碑就掀进井里去了。多数石碑在上世纪60年代时被砸破垒了地堰子和水簸箕（在土水沟的陡坡处为防止水冲泥土而铺上石板）。那眼井没有填死时，很多年轻人蹲在横斜于井里的石碑上，用手捧水喝。张吉夏和“庙主”（村民指看庙人家）杨家的一个孩子同龄，并且很投缘，是最好的玩伴。

村民赵光连，出生于1933年。他不识字，但记性非常好，在生产队里当了13年的保管员。他说：孟母庙是1946年砸的，那年他13岁。庙是用青砖垒的围墙，坐北朝南，进了大门后，有一道东西花砖墙，花砖墙上有东西两个门通向后面的正院。在后面正院里，正北是三大间正殿，大殿前檐有两根圆立柱，柱上没有字，柱子座在石鼓（即柱础）上。东边和西边各有三间偏房。大殿内有两个“神像”，一个是“孟母奶奶”（村民们对孟母的称呼），一个是“孟叔叔”（村人们对孟子的称呼）。孟母奶奶在北墙正中，面朝南，孟叔叔在东山墙上，面朝着母亲。砸破神像后，母子二像的肚子里都有一个碗口大的铜质“坠心镜”，还各有一卷书，此外是一些红绸子。塑像很精彩，蓝色衣裳。他家里就留了一本神像肚里的书，后来觉着没有用处，给了别人。当时“庙主”（看庙的人家）姓杨，住在三间西厢房里。杨家弟兄五个，支着小“红炉”，能造手枪。因为杨家兄弟多，又都会武功，于是作起恶来，经常干些绑票的勾当，把绑来的“肉票”藏在孟母庙里。后来这一带解放了，杨家才被人民政府抄了家，把他们赶出庙，同时把孟母庙也一起拆毁了。院子里有很多碑，但没有树。大门外一棵大柏树，梃子（树干）不算高，但很粗，二人才能抱过来。后面的坟墓用花砖墙围着，坟地有一亩多地，很多大柏树。这些大柏树被当年盘踞在沭水据点的日本

鬼子伐去架了沐河桥。孟母墓是在1966年的时候扒平的。用坟堆的土填了墓两旁的两条水沟，这两条水沟正是先人们为了保护墓、庙不被水冲毁而挖造的。坟墓扒平后，坟墓的四角上各有一块青石做的“石至子”。

孟母故乡是否在沂水，沂水的孟母墓是否孟轲之母——仇氏之墓，仍然有待于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的进一步考察论证。我这里只是想说：既然沂水的孟母墓、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就有向社会各界介绍的必要。



# 临沂名吃 (上)

亦名

## 糝

糝（临沂方言读sá），向以香辣可口、肥而不腻、营养丰富特点而为临沂人民所喜爱，也为省内外品尝过这一美味的顾客所称誉。糝的历史悠久，我国历史文献多有记载。春秋时代的名著《墨子·非儒下》载：“孔子穷于陈蔡，藜羹不糝。”《说苑·杂言》中就有“七日不食，藜羹不糝”的记载。《礼记·内则》称：“糝，取牛、羊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这里所说的“糝”，颇类今糝。清康熙年间《沂州志·秩典》所列12种祭品豆实中有“糝食”。相传糝是古代西域人的早餐饮料，唐时传入内地，而临沂糝则是由元大都（今北京）传来的。到了明朝，当地人将这种肉粥直呼为糝了。可见糝的历史源远流长。

喝糝有四大讲究，即热、辣、香、肥。一碗热糝配以油条、烧饼、烤牌等食用是美好的早餐享受。糝有牛肉糝、羊肉糝、鸡肉糝等多种，以羊肉糝最为普遍，鳖肉糝为珍。

糝的故事很多，流传最广的故事有两个。故事一：“糝”的名字与乾隆皇帝有关。话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经过现在的郯城码头镇，想品品当地的



名吃，当地的官员就把这种味道独特的早餐献了上来，乾隆爷一尝，怎么从来没喝过如此可口的东西，随口问了一句：“这是啥（糝）？”地方官员忙点头：“这是啥（糝），这是啥（糝）。”因此，天子的随口一问就成了它现在的名字——糝。

故事二：东晋时，一对穷困潦倒的外地夫妇逃荒来到临沂，当时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看到他们非常可怜，就经常接济他们，夫妇二人非常感动，无以为报。有一次，王羲之病了，二人觉得报恩的机会来了，就把家中留着下蛋的惟一一只母鸡杀了做汤，并在汤里加了一些普通的驱寒中草药。本想把鸡煮得烂一些，可看火的丈夫睡着了，不想汤就煮了一整夜。第二天，看着煮得黑糊糊的鸡汤，妻子很生气，可家里又没有其它东西，只好把煮“糊”的鸡汤送给了王羲之。再说王羲之本来卧病在床，吃了中药病也略有起色，但口干舌苦，没有食欲，看着送来的鸡汤，又不好意思拂了人家的一番好意，就盛上一碗尝了尝，没想到这一喝，登时神清气爽，病好了大半，一时兴起，随手提笔写下“米参”二字，到了后来，后人就把它称做糝。

### 八宝豆豉

八宝豆豉制做历史悠久。明代《本草纲目》谷部中即有记载：“豆豉，诸大豆皆可为之，以黑豆者可入药。有淡豉、咸豉，治病多用淡汁或咸者，当随方法。”临沂“惟一斋八宝豆豉”是用大黑豆、茄子、杏仁、鲜姜、紫苏叶、花椒、香油、白酒等八种原料经一年密封天然发酵而成，所以叫做“八宝”。豆豉色泽晶莹、香味独特、营养丰富、有生津开胃、降逆消食的作用。费孝通先生题词赞誉“齐鲁名产，醇厚清香”。

关于八宝豆豉的由来，相传在清朝道光年间，山东沂州府的垛庄（今在蒙阴县境内）有位老妈妈，用大黑豆、茄子、香油作主要原料，腌制出的酱菜，味美可口，取名为豆豉。垛庄的一位酱园师傅彭三，从其手中学到技艺，后临沂城内“惟一斋”酱园慕名将彭师傅请到该园制作豆豉。“惟一斋”酱园将其他地方的类似制品配方和技艺搜集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终于研制成独具一格的临沂八宝豆豉。临沂八宝豆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谷氨酸、赖氨酸等营养成分，具有温中健脾、益气补肾、滋补润燥、舒筋活络等保健功能。



## 塌煎饼



煎饼，是沂蒙山区民间传统家常主食，也是久负盛名的地方土特食品。从使用的原料方面分类，可分成麦子煎饼、玉米煎饼、小米煎饼、高粱煎饼、地瓜煎饼等，不同的烙制工具，不同的原料，其味道也各不相同。烙好的煎饼薄如纸，折叠成卷，即可食用。经过晾干，叠成长方，可存放半月到一个月之久而不变质。出门携带也很方便，因此，人称干粮。清代蒲松龄在其《煎饼赋》中写到，“煎饼则合米豆为之，齐人以代面食”，“圆如银月，大如铜缸，薄如剡溪之纸，色如黄鹤之翎，此煎饼之定制也。”煎饼因是用原粮制作，麸皮没有去掉，所以营养丰富，且便于存放和携带，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地方食品；而塌煎饼则是用煎饼再加工而成。

塌煎饼做法：将鲜而嫩的韭菜或白菜、荠菜等蔬菜洗净，切成比饺子馅稍粗的段；鸡蛋，打入锅内先炒，再切碎与菜馅合二为一，放入盐、油、放少许薄荷叶，掺入粉丝、豆腐皮等拌匀。放在鏊子上翻炒至七八成熟，倒在两张摊开的煎饼上，匀平，把煎饼边卷起包严平压，放在烧热上鏊子的两面翻塌。火要文，热要匀，时而翻弄，看得见煎饼内有热气滋滋外泄，瞧得见煎饼面皮焦黄，取下稍晾而食，外脆内软，风味独特。

## 王氏熟梨

王氏熟梨在临沂城享誉盛名。它是熟梨王王玉成用祖传数百年历史秘方烹制的熟梨，用料讲究，风味独特，为中华一绝。熟梨酥烂化渣，入口即化，甜香醇厚，有清痰泻火、润肺止咳、解酒利尿、除烦去燥、养肝益心之功效，对慢性气管炎、哮喘肺热有一定的疗效。

过去，王氏熟梨一般在夜幕降临时上市，售卖时配以悠扬的售卖歌，人们听到歌后，纷纷前往购买，食者赞不绝口。

1993年，笑星赵本山食梨后把此歌搬上舞台。1997年被山东省经贸委评定为“山东名吃”，中国烹饪协会评定为“中华名吃”和“中华熟梨王”称号。王氏熟梨2001年经国家工商局注册商标。陈毅、谷牧、费孝通等名人都曾赞誉过此梨。

原料：山东平邑天宝山黄香梨、浙江温州冰糖、四川峨嵋山川贝母、熟





梨原汁老汤、南国红豆、曲阜大枣、桂花酱、香白芷、香料等。制法：梨精选，南国红豆泡发，香料包裹好；主配料下入特制灶具内，加老卤、新汤、调料卤制酥烂即成。

### 锅塌鱼

锅塌鱼又名元宝锅塌鱼，为临沂城名吃，因形扁、无骨、塌倒而得名。1986年获山东省名菜大奖。

锅塌鱼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初。当时临沂名厨高钧的舅父盖京义（也是名厨师）有一次来高家做客，谈及孔府剔骨鱼的味道和烹饪技术，高钧十分留意。后来，他用本地肉鲜味美的沂河金鲤鱼，参照孔府剔骨鱼的工艺，进行了多次烹饪试验，终于创制了锅塌鱼这道名菜。做好锅塌鱼有两个关键：一是选好料，即用鱼必须是当天的新鲜鱼，每条约一公斤左右；二是将剔骨处理好的鱼入锅烹饪时，要掌握好火口。这样才能做成一种色金黄，形扁圆，味香甜，质嫩软的绝口佳肴。锅塌鱼味道鲜美，一向为人乐道。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同志曾到泰丰饭馆吃高钧做的锅塌鱼，并大加称赞。

1983年，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在品尝了这道名菜之后，称道临沂锅塌鱼名不虚传，并说“锅塌鱼是怀才不为人知，盐车下的骥马”。



## 潘湖狗肉

沂蒙地区名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闻名。狗肉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且具有入药疗疾的效用。狗肉味甘、咸、酸、性温，具有补中益气、温肾助阳之功。《普济方》说狗肉“久病大虚者，服之轻身，益气力”。

《本草纲目》中载，狗肉能滋补血气，专走脾肾二经而瞬时暖胃祛寒‘补肾壮阳’，服之能使气血溢沛，百脉沸腾。故此，中医历来认为狗肉是一味良好的中药，有补肾、益精、温补、壮阳等功用。民间也有了“吃了狗肉暖烘烘，不用棉被可过冬”“喝了狗肉汤，冬天能把棉被当”的俗语。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狗肉中含有少量稀有元素，对治疗心脑血管缺血性疾病，调整高血压有一定益处。狗肉还可用于老年人的虚弱症，如尿溺不尽、四肢厥冷、精神不振等。用狗肉加辣红烧，冬天常服，可使老年人增强抗寒能力。但要注意的是，由于狗肉性温，所以有阳虚内热，脾胃温热及高血压患者应慎食或禁食。

据传说，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绕道沂州专尝潘家湖狗肉并大加赞誉。

原料：健壮成年狗、调味佐料、陈年老汤等。制法：活狗放血剥皮，破肚去脏，大卸五块，用深井水浸泡2日，中间换水三次；部分作料深加工，然后混合粉碎待用。狗肉、佐料、陈年老汤、新汤入锅卤熟，折骨入盆；骨头回锅再煮，把握住余汤的数量，经过滤后灌入盛狗肉的泥瓦盆中，加适量调料拌和均匀冷却即成。食用时手撕成条，不可刀切，以免影响口味。特点：色泽红润、口味香美、醇厚不腻、久食不厌。



## 蒙阴光棍鸡

蒙阴地方名吃，以其独特风味，风靡沂蒙山区。创始人付泽明在蒙阴县城西岭开设炒鸡店，以烹制蒙山大公鸡为主，以其口味鲜美、风味特殊吸引了大批食客。因炒鸡店工作人员全部是男士，取材又全是大公鸡，便将此菜名曰“光棍鸡”，此店即叫“光棍鸡店”。

1995年，光棍鸡在国家工商局进行了商标注册。今临沂、济南、北京等地均有其分店。



原料：一年左右草公鸡一只（约2000克），猪油70克，青椒50克，姜、葱、酱油、高汤、盐、味精、陈皮、八角、花椒等30多种药料各适量。制法：鸡宰杀洗净，改成劈柴块；葱切段、姜切片、青椒切片；勺放油煸姜片、葱段下鸡块炒至灰白色无水分时放酱油再炒至鸡块酱红色加入高汤、盐、药料等温火炖20分钟，待汤汁浓稠时下青椒、味精装盆即成。特点：色泽红亮、汁宽味浓、鲜香醇厚、药香浓郁。

### 莒南驴肉

世人向往的美味，素有“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之说。

莒南毛驴纯饲青草等无公害绿色植物，饮天湖、石泉湖天然矿泉水，其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闻名全国的“莒南老地方驴肉店”，在驴肉的烹制上有独到的功夫，制做的熟驴肉奇香，肉汤奇鲜，深受食客称赞。配以色泽澄黄汁汤，辅之浓香咸辣的作料，色、香、味、形俱佳，是大补佳品，令人百吃不厌。

莒南老地方驴肉馆，因位于交警队对过，吃客一般都说：走，吃“交警驴”去，久而久之，知道“老地方”店名的人反而少了。

制法：剥皮整驴一头，带骨分割成块，放入清水中浸出血污，锅加大葱、生姜（拍碎）、作料包、料酒、肉块、下货，加入水浸没原料，旺火烧



开，撇去浮沫，小火烧至肉块熟而不糜，停火起锅，取肉块切片食用。

### 沂南苗蛋



沂南苗蛋为临沂土特产之一，因产于沂南县辛集镇苗家曲村，故名。该村所产鸭蛋皮淡绿、清爽，白清嫩，蛋黄红润，起形沙瓤，割开蛋黄淌油，吃起来清香可口；且夏天不招蚊蝇。历史上有“汤蟹、苗蛋、莒州大蒜”之说。

苗家曲村，位于辛集镇驻地北1公里处。过去潮沟河（今称苗家曲河）上的老万、老龙潭等五六个洲子三面环村相连，水域面积广，水深处多达丈余，鱼虾蚌螺多。鸭子食物丰富，产蛋率高，蛋大，多双黄，其蛋壳淡绿细滑，蛋黄分层、多油，香味浓郁，久放不坏。用老龙潭的泥和水加食盐腌制后的苗蛋，有香蛋、咸蛋之分。香蛋蛋黄紫黄色，吃时黄油外溢，醇香微咸；咸蛋蛋白微黑，蛋黄灰色，较咸。煮熟切开后，不落苍蝇，为蛋中佳品。

由于修路、造田等原因，现在苗家曲村周围的水域面积减少，养鸭数量和苗蛋产量略有减少，但苗蛋仍以其特有的风味，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传说明朝正德年间，武宗皇帝出巡路过此地，品尝苗蛋后赞不绝口。清朝乾隆皇帝三下江南，第一次路过莒县，为吃苗蛋，专程到苗家曲村，并下圣旨：“兴苗曲在，不兴苗曲坏”，要苗家曲村每年向北京进贡苗蛋1000个。从此苗蛋远近闻名。199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亚运会上，苗蛋成为各国运动员餐桌上的一道菜，为中外人士所喜爱。



# 老家那一域里的“四大件”

郑玉强

常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仔细观察一下，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中国地方忒大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一处有一处的风土民情，即使两地相隔很近，也难求一致。

在老家那一域里，以映旗山为界，山前山后风俗习惯截然不同。因为啥呢？映旗山前大片区域从历史上一直隶属沂州府兰山县（临沂县），而山后呢，则是隶属沂州府沂水县。不同县域，不同一片天地，不仅风俗不同，说话语调都不一样，何况其他呢！今日不说别的，专谈映旗山前那一域里的“四大件”。

“四大件”指的就是待客时餐桌上的四个“大件”。其实就是四个大盘盛满佳肴，都称之为“大件”：即大鲤鱼、卷煎、方肉或片肉、炒鸡。不论谁家婚丧嫁娶，待客的餐桌上这四大件是不能缺少的，若少了一个大件，那就显示日子过得很穷困，主人脸上也无光了。有的还外加一盘“喝茶果”，即一大盘酥饼，边喝茶边吃它。现在，生活水平高了，这盘喝茶果在有的家庭里不当好东西，业已取消了。但有的家庭，一开始坐下喝酒，端上来的第一盘，依旧是这个喝茶果。老风俗习惯了，看来改也难啊。

第一个“大件”：大鲤鱼。大都去市场上购置五六斤重的鲤鱼，如小了彰显着小气，主家觉着不好看相。回来由聘请来的厨师专门料理。都是先早蒸熟了，上桌时现加热，配上佐料，就是一盘令人馋涎欲滴的美食。这盘大鲤鱼，



往往一端上来，来客觥筹交错，风卷残云，一会了就吃光了。这大概是因为一般都先上这个大件，此时来客肚子都饿了，鲤鱼又可口好吃的缘故。

第二个“大件”：卷煎。黄灿灿的卷煎，则是用鸡蛋烙成煎饼状，然后把剁碎的精猪肉放入，卷成条状，放到锅里蒸熟，上席时，切成菱形块状，加入佐料再炖。此是带有地方特色的一道菜，在青驼古镇、老石头集的酒店里就有这道菜。我每当遇到，呵呵，那是馋涎欲滴，吃不够的。在县城酒店里，偶尔也会遇到这道菜，但口感味道均较差，吃进嘴里感觉太柴了，鸡蛋皮子散而无味，与青驼、高里一带的卷煎品位差距较大……大凡酒桌上，端上这一盘来，常常剩下的也不多。

第三个“大件”，方肉片肉就不用细说了，就是把猪肉切成方块状或片状，但里面的技巧则是每一块肉要有肥有瘦，这一点也是有讲究的，不能全是肥腻的，也不能全是精瘦的。年轻时，去一位亲戚家喝喜酒，巧遇读高中时的一位同学，喝酒中间，上菜的端上来这个大件，喜欢吃肥肉的我连吃五六块肥肉，把那位同学都“吃”愣了眼，和我开玩笑说，你这脱产的平时“靠”不着吧？他那意味，“脱产的”大概平时荤腥多一些，遇上“大件”也不能享用，应只能吃青菜……我也听出这位同学话里的嗤笑之意了，但有美味在侧，谁管他呢！懒得计较，还是照吃不误……然而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是不敢再如此大快朵颐了。

好像，现在大凡酒席上，对这个大肉都不敢过多摄入了，尽管今天它依然很贵重……

第四个“大件”：炒鸡。这盘鸡司空见惯，更不用仔细描述了。这是盘有着悠久历史的菜肴。有句常挂在嘴边的俗话，常说，有心不当吹鼓手，还挂掂着那盘鸡；就说明这个“大件”在酒席当中，是有些年头的了，也说明是必不可缺少的。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餐桌上有盘鸡，那就是一种上等的招待了，对那些客人、吹手等帮忙的人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待遇。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农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个“大件”，分量也在变大。盛菜肴的盘子大了，鸡肉也多了。据说，这一盘佳肴需要用三四只鸡才能做成，去掉鸡腿鸡头，专捡肉多的部件上盘……体现的是主家的诚心诚意啊！

除此之外，当然餐桌上还有号称几凉几热，几个碗几个盘之说。而今，盘中餐也有时兴的佳肴了，有蟹有虾有蝎子，有鱼有肉有丸子；有冷盘有热炒，还有汤煲新鲜水果之类……不过，吃完那几个大件，后上的这些菜肴，客人就不大动筷了。



沂蒙古村落之——

# 崔家大院

耿志刚

河东区九曲街道办事处独树头村崔家大院，原是显赫一方的大户崔氏一族的住宅。除了有明清时期所建宅院、庙宇、祠堂、炮台等古建筑外，建国前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后勤部、临东区政府、独树头乡政府等均设在这里。

据碑志记载，崔氏自明朝末年由山西迁至沂郡东北乡距城15里独树头村，分为南、北二支。清乾隆年间，崔家土地众多，东到相公庄，南到于埠村，西到沂河，北到高庄村，五六千亩土地，大部分租给雇农种。除雇工种地之外，还大兴工商贸易，大兴土木建造宅院，先后建有连环宅、小八卦、三宅六院、三宅九院、套宅、串堂院等，各式各样的古建筑布满村落。清末，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尤其东北、西安、山西等地往来很多，这里逐渐成为临沂地域商贸经济发展的中心，被老临沂人称为“二沂州府”。

至崔氏五世，北支兄弟六人分家自立门户，各自经营。我们现在所说的崔家大院，系北二支崔廷诚后世所居宅院。北二支下有协泰、长园、永盛等商号，经营着酒店、酱园、点心铺、油坊等实体店。因北二支发家最晚，大院修建的时间相比其他支族也晚，且宅院相对集中，保存完整。整座宅院在连接各座房的后门为中轴线两侧辐射布局，每排房子右面有一条胡同，房子



2014年重建的崔家大院



这是一座套宅。这样的套宅、串堂院的古建筑曾遍布全村

前面有一条深巷，每巷四户，联成一个整体，形成明显的大户院落。

崔家没落始于抗战时期。崔家的大户有的在战争中伤亡，有的外出逃难。常年经商的崔氏后人，有不少干脆留居在异地他乡。解放后，崔家大院仅剩下“空城”一座。崔家北二支大院用作独树头公社驻地，社员们推着粮食来大院缴公粮。大院在坊间名声大作，有关崔家北二支的历史也就越传越广。上世纪80年代，崔家北二支大院遭到破坏，西院槐荫堂、八卦宅等古建筑全被拆除，原有房舍所占土地均被分给村民翻盖了新房。此时的独树头很多前出檐后出厦的老建筑也残存无几，仅剩下东院北三支几处住宅。

2010年9月独树头村旧村改造，最后几处残缺古建筑悉数被拆除，唯有几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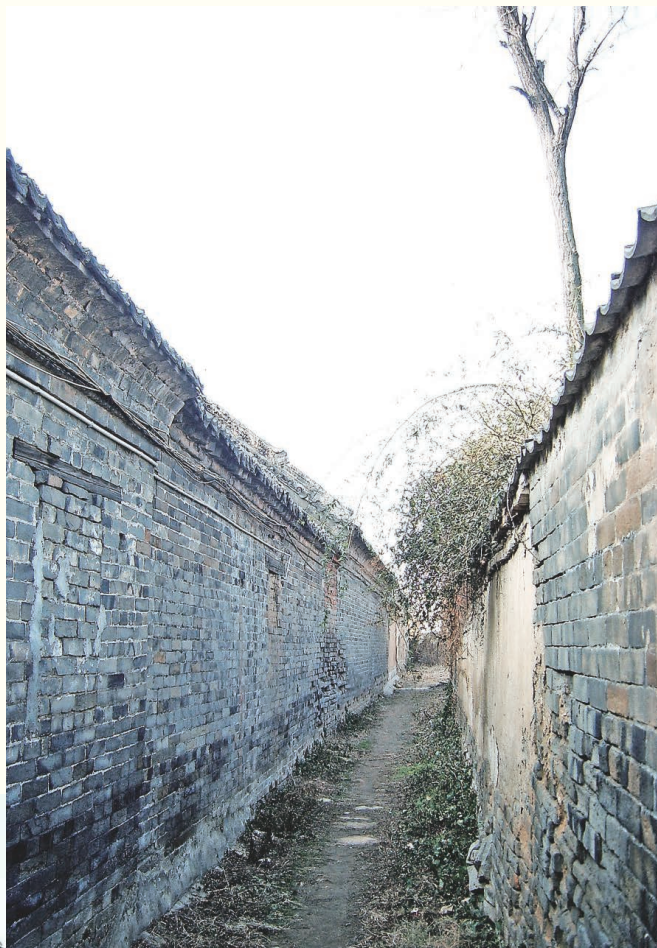


每排房舍四户，联成一个整体，形成大户院落



历经风雨侵蚀的青石碑和古树遗存。但是，独树头村崔氏一族曾经的持家之道、兴业之举以及家族光辉史依然留存在长辈的记忆中。

2014年，在距原址1000余米的新四军军部暨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附近，以崔家大院为原型，恢复重建了明末清初古代建筑群，占地面积约100亩。



每排户子右面有一条胡同，房子前面有一条深巷



前出檐后出厦是这些老建筑的特色



2010年独树头村旧村改造，这几处残缺古建筑被拆除

# 黎 玉

本 编

黎玉（1906—1986），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1925年5月参加革命，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直南特委书记和冀鲁豫边特委书记。1936年，黎玉同志奉中共北方局命令，前往山东恢复和重建屡遭敌人严重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黎玉同志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副书记、代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首席组长，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等职。黎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黎玉同志任华东局第二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



黎玉在沂蒙山区



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  
黎玉与夫人张季梅



1943年春，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左三）、委员陈光（左四）、黎玉（右一）与滨海区党委书记符竹庭（左一）在滨海区合影。左二为陈光爱人史瑞楚。



罗生特（左一）、萧华（左二）、黎玉（左三）、黄农（右二）、谷广善（右一）在山东合影



黎玉（后排左二）与夫人谢青（后排左一）在渔船上

# 扑灭朱陈霍乱疫情始末

于岸青

1946年8月4日上午10点，一架来自青岛的飞机降落在临沂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两名外国女士。其中一位身着美军少校军服，分外引人注目的是，她是一位黑人。她的中文名字叫雷黛德，此时的身份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少校医官，另一位是她的护士道义尔。

雷黛德来临沂是受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山东分会之邀，协助扑灭正在临沂朱陈镇流行甚炽的虎列拉传染病疫情。“虎列拉”是英语“霍乱”的译音，属于国际检疫传染病之一，目前仍是我国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雷黛德的到来，使我解放区这场扑灭瘟疫的战役有了些许国际色彩。

## “流行病第一杀手”突袭朱陈

朱陈镇位于临沂县城西南十多公里处（现临沂市罗庄区），是临沂周边最大的村镇，镇上有1000多户人家4000多口人。镇上手工制瓷业发达，盛产黑釉碗体白胎圈足的大瓷碗，隔一段时间村民就三五成群推着小木轮车装上黑瓷碗四处贩卖。

这年盛夏，当地天气炎热加上阴雨连绵，致十分潮湿闷热。村民周友臣、李洪才等9人相约推车往兰陵一带贩卖瓷碗，7月2日途中打尖（行路途中吃便饭），李洪才贪凉喝了大量冷水，下午发病，上吐下泻，次日夜间不治身亡。

没人知道，李洪才得的正是传染性极强的“虎列拉”。4日，同行的人将李洪才的遗体运回朱陈。当地旧俗，亲人去世至少要停灵两三日才可下葬，于是李家将灵床苦席放在街上，然而天气炎热，尸体已开始腐败，苍蝇四飞，遂形成第一轮污染。第二天提前出殡，前往吊唁的亲朋乡亲达百余人。礼毕，大多数人都吃了李家准备的饭食，导致第二轮污染。下葬之后，李家人还按当地旧俗，将李用过的衣履秽物扔进了村边的河里，再致河水污染。

到8日，李洪才的近邻王哲英突然发病，数小时后即告不治。从这时开始，霍乱在朱陈开始蔓延，短短两三天，全镇5条街均有染病者，许多染病者数日内脱水而死，镇上一家双棺出殡者不在少数，最高峰时一天死亡者竟达十七八人之多。随着死亡人数增多，往河里扔东西、洗洗涮涮的人越来越多，被污染的河水顺流南下，自朱陈镇、朱张桥、赵家坝、傅家庄直到庄坞，沿河造成大面积污染，有十多个村庄千多户人家被传染发病。

19世纪之前，中国没有霍乱。山东初次发现霍乱是1821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共发生40多次大的霍乱疫情，包括朱陈这一次。1946年之前的30年间，当时

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前前后后有6次霍乱大流行，死者无数，还不包括不间断的轻微流行。霍乱，可谓那时“流行病第一杀手”。

疫情重大，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7月14日，有群众到临沂县医救会（医药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求助，朱陈疫情才为外界所知。县政府立即派七区区长李金涛、政治指导员颜寿山等人奔赴现场。首先采取措施封锁疫区，发动民兵在村各路口站岗，不准走亲戚，也不准赶早集，向村民宣传防疫知识，打苍蝇蚊子，组织当地医生抢救，并报请省政府。

临沂县医救会主任李鸿慈带领医救会的几位中医率先到达疫区。李老先生年过花甲但职责所在，慨然参战。他们与已经奋战数日的朱陈镇针灸医生陈凤合一起，用中医方法抢救患者，数日间有4个危重患者保住了生命，轻患者数十人渐痊愈。然十几天昼夜辛苦，医生们全都疲惫至极难以支撑，陈凤合和李鸿慈先后染病，陈凤合不幸牺牲在抢救第一线，成为陈家第四个染疫而死的人；幸李鸿慈被及时抢救，转危为安。

### 反迷信是最紧要的任务

7月19日深夜，临沂县的紧急报告递到山东省卫生总局。报告称：“朱陈镇人户一千一百多户，在这五天当中已有二百多人受病，已死大人小孩二十余人，今天正在连夜治疗当中又死四人，此疫病如不再设法防治，将来不堪设想。”局长白备伍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专家们根据报告判断此疫为霍乱。疫情如火情，总局当即决定马上派出医疗防疫队。

抗战胜利前夜，1945年8月12日，山东省政府在莒南正式成立，省卫生总局同时成立，山东军区卫生部长白备伍任局长。不久，其下设的巡回医疗队便成立了，在疫病暴发时即被派往各根据地疫区抢救病人，为扑灭疫病、挽救疫区人民的生命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时，巡回医疗队6月初才从各地刚刚返回，据1946年5月25日《大众日报》报道：“第一医疗队在沂源淄博等地抢救；第二队在温城县、赵钊县抢救；第三医疗队在郯城抢救；第四医疗队在临沂县抢救，历时约一月之久，四个医疗队共为人民抢救（抢救治疗）回归热一一七四（1174）人，麻疹四二（42）人，斑疹伤寒八九（89）人，脑膜炎三五（35）人，痢疾十人，流行性感四六〇（460）人，疟疾二二（22）人，大叶肺炎一人，外科十六人，并治疗其他疾病一二四二（1242）人，总共救治三千零九十一人。在抢救中人民流行着一句话：‘咱们民主政府来了救命，顽固派来要命！’”

天刚亮，队长徐坚率防疫队就出发了，白备伍随队赶到朱陈，坐镇指挥。在朱陈，他们吸收张兰田、许进榜、左新文、马健、孟庄林、李乐善、刘全金等当地18位中医参加，共同施救。

徐坚将所有医务工作者中西医混搭，分成四组，划片救治。实行三天后，感觉病人分布不均，这一方法效率不高，重又调整，将药品集中有针对性使用，药房设专人坐诊，其他医务人员则全部出诊，变仅治疗为治疗与防疫并重。每天晚上汇总情况，徐坚、怡然等省卫生总局专家就每天的施救情况进行专门指导。

省防疫队与区公所配合，通告全区，“灭蛆捕蝇、整理各庄街道（两边挖引水沟）、井边放公罐、禁止卖冷食者（瓜、凉粉等）、断绝向朱陈镇通行及禁止闲人各街乱逛或走亲戚家以防传染、用开水烫洗碗筷并盖好食物防苍蝇、揭发神婆造谣惑众并制止一切敬瘟神的举动。”

没想到，最后一条措施——揭发神婆造谣惑众并制止一切敬瘟神的举动，竟然遇

到最大阻力。人人自危中，镇里谣言四起，“镇西南的桥是龟脖子，因为大家踩了，所以有病”“有五百瘟鬼在南庙开会”；大多数群众家门上贴着纸剪的狗，上写“神狗，神狗，把着门首，瘟神一见，回头就走”；甚至有人相信“阎王爷点了谁的卯簿，一定活不了”，干脆坐着等死……深信谣言的群众对灭蛆捕蝇扫除污秽的要求，不爱听，不去做，即使做也马马虎虎地应付“公事”。最令人着急的是，当地有些干部思想上不通，认为疫病是“天意”“瘟神”，所以根本不向群众传达防疫要求。

反迷信成了最紧要的任务，如果不把迷信反掉，卫生防疫工作就难以展开，疫情便难以控制。防疫队当天晚上再次召集全镇干部开会，苦口婆心地指出现在桥不走了，瘟神也敬了，可病还是流行；造谣的神婆病的病、死的死，神婆孙高氏领头敬神也病死了，南庙老和尚拒绝救治，念了一天经后就死了……同时，讲清楚“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七区区长特别批评了思想顽固的北大街农救会长。事实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次日各街民兵及干部头挨家挨户上门督促。

防疫队列出反迷信工作事项，要求每个上门的工作人员照单去做：“1、广泛向群众说明病是从哪里传来的，是什么病（这点最紧要）；2、以敬神之后死的人（挤跪在一块，吃贡品等传染），和尚和巫婆的死，作为实际宣传教育事例（这点最有效）；3、画漫画，揭穿神婆的内心，是为自私自利敲钱的；4、出墙报及写大张的公开信加以揭破，并提出具体防疫法；5、医生一边看病，一边注意宣传。”

经过艰苦的工作，疫情从26日开始缓和。可是不少群众便开始松懈，“卖瓜果的到处皆是，卖粥的共用饭碗，菜馆子开门了，而食物也不盖，苍蝇也不打了，街道也不整理了，门岗也不严格了”，还有的群众讲怪话，认为“卫生忒讲究了”。到8月1日，朱陈十字街因一个二流子串门子吃喝“着病”（感染的意思），全街复又出现大量感染者，疫情出现反复。

### 采用雷黛德提出的方案

转机在8月4日到来。雷黛德来了，她带来了5万支霍乱疫苗。

雷黛德是受“解总”山东分会的邀请而来。

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和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解总”）先后成立，以二战剩余物资救济中国难民。1946年初，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山东分会成立，白备伍任分会卫生组长，主要负责就医疗卫生事项与“联总”“行总”的官员接洽，这样，他与“联总”派到山东主管医药卫生的工作人员雷黛德和护士道义尔接触频繁，建立了友好关系。

雷黛德来自美国，是医学博士、传染病学专家，在法国求学八年。当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接见她时，二人用法语愉快地交谈起来。陈毅对她说，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是希望早日实现和平的。为了执行人民意志，实现团结建国，我们遵守协议，新四军由南方撤到北方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而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反共反人民，发动内战，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向解放区进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些话对雷黛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接见后不久，雷黛德获知朱陈暴发疫情，便要求到病区进行调查，主动向“联总”申请了霍乱疫苗。

雷黛德到临沂后，马上与白备伍进行了短暂的情况交流和商讨，决定疫苗优先供朱陈、傅家庄等疫情严重的四个村镇及人口稠多的城关两地群众注射，计划这项工作用七天至十天来完成。



黄农（又名王雨田，时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一排右一）罗生特（卫生部顾问，二排右一）白备武（卫生部原部长，后排右一）谷广善（卫生部政委，后排左一）刘放（卫生部副部长，一排左一）

扑灭疫情从来都是大型战役。虽然此时内战已经全面爆发，但“解总”依然与“联总”“行总”携手作战，成立了鲁青区联合防疫委员会临沂分会，方便行政，并加派我鲁中军区医疗队、临沂医院医疗队、滨海医院医疗队等赴疫区，“行总”鲁青分署第三工作队也派员参战。

5日，白备伍与雷黛德等抵达朱陈后，立即与七区政府召开简短会议，决定为防止疫病继续蔓延，立即成立区防疫指挥部，由区长任总指挥，区武装部长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纠察队、宣传队、治疗队。纠察队由各庄调集30至50个民兵组成，将疫区封锁，隔绝病区与外界来往。宣传队由当地干部及小学教员组成，到处进行预防及治疗“虎列拉”的宣传教育。医疗队则由医救会、卫生局及当地中医西医组成，至各庄进行注射、治疗。

从这时开始，治疗采用的是雷黛德提出的方案：20毫升至50毫升17%生理盐水一次静脉推注，迅速解除病人脱水症状；再继续给病人静脉滴注生理盐水或葡萄糖盐水；进一步好转后改口服淡盐水或糖水，同时口服大剂量的磺胺呱和维生素B1、维生素C。

此方治疗效果十分显著。省防疫队医生怡然马上将这个处方公布在了《大众日报》上，“在临沂县抢救虎疫中，大多是用联总雷黛德氏介绍治虎疫之有效处方抢救的。这个处方的效力很好，大多患者均经此方治愈，如朱陈镇试用十七病案，亡者六人，在傅家庄治二十人中死二人。”这给了其他疫区很好的指导。

在朱陈紧张工作10天后，雷黛德与白备伍转到距朱陈十几公里的唐家沙沟继续抢救。七区区长在欢送会上说：“多亏白总局长亲临现场并带来专家，用了有效方法，救了老百姓，不然我们这个区不知要死多少人，说不定朱陈要断绝人烟了。”《大众日报》记者这时采访了雷黛德，报道中说：“雷大夫是联总或行总人员中，真真深入到解放区农村中去进行救济治疗工作的第一个人。她这次在乡下一共注射了有二三千针，她每天六点钟起身，晚上一直忙到十一二点钟。除了每天三餐饭后的半小时休息外，其余的时间差不多全部都花在工作中，天天在烈日下，自这家跑到那家，不论是怎样窄小的茅屋，病人怎样呕吐了一地的饭水，她也还是亲自至病人跟前，问他病状，细心地治疗。”雷黛德在疫区连续工作了20天，大大延长了行期。临返回青岛前，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接见了雷黛德，“对雷大夫的竭诚帮助与亲自动手不辞疲劳地抢救病人，表示万分感谢”。



滨海军区医院医生在作化验检查

雷黛德带来的药品全部投入治疗防疫之中，但仍有缺口，省政府紧急拨款200万元，通过各种关系购买疫苗，专为群众注射。

### 参考《大众日报》霍乱专刊

科学方法加上组织得当，到9月26日，“临沂防疫指挥部”在《大众日报》上宣布：“临沂、费县境内虎疫经省卫生总局、联总雷黛德医师及滨海行署、临沂县府之卫生机关等两月余之抢救，基本上已被扑灭。两县发病地域计九十六村，患病者一千八百九十四人，两月来治愈者达一千三百九十八人；注射疫苗者，六万八千六百七十四人。陷入虎疫威胁之四十五万民众，遂得解救。”

必须看到，此次疫情得以迅速扑灭，报纸的宣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7月28日开始到9月26日，《大众日报》刊发各类报道18篇，及时通报信息，戳穿谣言，传播科学知识，公布救治办法。省卫生总局用老百姓的语言在《大众日报》发出呼吁：“现在民主政府派去医生正在病区抢救。老少爷们！我们应跳出迷信的苦海，朱陈镇有两个神婆也病死了，所以说没神也没鬼，说有瘟神全是骗人的。传染病好比失火，这里将扑灭，那边又放起火来了，因为大家不注意防治，如向河中丢死人用的东西，使病菌传播，这样永远不能扑灭，只有大家注意下面的事，才可保全大家的平安，扑灭病害，停止再着人（染病的意思）。”

《大众日报》陆续推出两个整版有关防范霍乱的卫生专版。9月7日，刊发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发布的《山东省政府关于防治霍乱的指示》，将防治与治疗的有效办法以政府的指令形式进行宣传，指令中特别指出，“其他宣传治疗等办法，参考《大众日报》八月份‘卫生’霍乱专刊”。

宣传有了很好的效果，册山区老沂庄的一位老百姓去傅家庄买酒，回来即得霍乱而死，幸该庄有某机关驻防，闻讯即以迅速之方法督促埋葬，衣服被子碗筷煮沸五分钟，家内院内之排泄物都以石灰掩盖后打扫，并埋入土中。经此措施后，该庄霍乱未得流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防疫范例。

到9月3日，朱陈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这天召开了朱陈首次反内战大会，当场有73名青年报名参军，黎明时，全区各村庄即响起欢送参军的礼炮，此起彼伏，人潮涌向湖西崖村，锣鼓震天响，识字班、儿童团扭着秧歌高唱，每个人都露着真诚的微笑。



# 费县的三个古老姓氏

平凡

按照清代李景星《费县乡土志》的记载，费县最古老的氏族是颛臾氏，但是由于年代遥远，早已湮没。家住武城的孔子弟子澹台灭明，其后裔澹台氏，也已湮没无闻，无从考证。到了清代晚期，居住在费县的古老氏族还有三个，即曾氏、闵氏、卜氏。他们都是孔门弟子的后裔。

## 曾 氏

曾氏是先贤曾子的后裔。曾子，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他16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曾子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正宗传人，他把孔子的思想和学问传授给弟子，又将孔子的言行整理成《论语》，上承孔子之道，下开思孟学派，对孔子的思想一以贯之。著有《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后世尊奉曾子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曾氏是治水英雄大禹的后代。大禹姒姓，他从大舜手中接过帝位，开创了夏朝。大禹死后，儿子启接位。夏启的长子叫太康，次子叫仲康。仲康的孙子叫少康，他复兴了夏朝，天下安定，百业兴旺。少康把小儿子曲烈分封到一个叫郕的地方，建立郕国（今山东兰陵县）。郕国被莒国兼并后，其子孙逃往鲁国，为不忘先祖，把郕去掉偏旁“卩”，以曾为姓。

曾子故里在费县武城（今平邑县魏庄一带）。关于曾子的里籍，史籍多有记载。《孟子》：“曾子居武城。”《论语》：“子之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自武城”，哀公八年“从武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山东考古录·考武城》说：“夫与郕郕为邻而当吴越之路。邑山险而人勇悍。此今费之武城也。”

清代初期，朝廷在曾氏后裔中选拔曾氏奉祀生，经礼部审查注册，给以衣巾奉祀，负责曾子祠墓的具体事务及祭祀仪礼等。清雍正四年（1726年），设有曾氏奉祀生18名。至乾隆年间，陆续增加到41名。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礼部咨复山东巡抚国泰，准予费县曾皙、曾参墓各设立奉祀生1名。据《光绪费县志·荫袭》记载：“曾毓池、曾毓沼、曾毓銮，宗圣七十代孙，袭奉祀生；曾传道，宗圣七十一代孙，袭奉祀生；曾纪忠，宗圣七十二代孙，袭奉祀生。”

《光绪费县志·人物》记载了一位曾氏孝悌人物的事迹：“曾传文，幼失怙，事母孝。咸丰季年，捻匪北犯，居民逃匿山谷间。其母年已八旬，传文弃其妻子，负母奔逃，数里力尽，路旁有微坎，伏母其中，以身蔽之。贼马步数万，所伏之处适当其冲，而贼终不睹。妻子在家亦无恙。后以齿德膺耆宾，寿八十岁。”

平邑县辉泉和沂南县曾家村、窝庄，先后发现了5通较有资料价值的曾氏墓碑和谱碑。辉泉村原属费县西北乡资邱社，沂南县窝庄原属费县东北乡相家庄社，两地均为古费邑之地，故该地曾氏称为费邑曾氏。

据曾氏墓碑和谱碑记载，因为先贤曾皙墓在武城，曾氏后裔守先人之墓，一直居住在武城。曾家村曾氏五十五世前，辉泉曾氏六十八代前，均居武城，世守其墓，为曾子故里后裔。窝庄续修谱碑称：“五十五世祖彬公，由武城迁于费之东北乡曾家村，至六十四世祖闻智公、闻魁公兄弟析居，闻智公分居窝庄，是为窝庄一支。”曾家村曾氏，自五十五世始自关阳武城迁居曾家村起家立业。至清道光元年，曾家庄分支窝庄后裔立谱碑时，该村曾氏已传至七十一代，因此曾家村曾氏在当地已传十七代，窝庄分支已历八代。

费县新桥镇（2011年划归临沂市兰山区）有曾氏后裔，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曾氏七十一世孙曾昭余由沂南县青驼镇居窝庄迁来，定居在沂河左岸的前店子村。

曾氏字辈排序为：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 闵氏

闵氏出自姬姓，以谥号为氏。春秋时，鲁国国君鲁庄公死后，他的儿子名叫启，后继位为君，是为闵公。启继位不到两年，便被庆父所弑，因年纪尚轻，谥号鲁闵公。古代“闵”与“悯”字义同，都有怜惜之意。鲁闵公的后世子孙，以其谥号“闵”为姓，称为闵氏，世代相传。

费县闵氏是先贤闵子骞的后裔。闵子骞，名损，字子骞，鲁国人。以德行著称，被列为“孔门十哲”之一。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闵子骞被追赠为“费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进封“琅琊公”，并遣尚书陈尧叟到沂州祭祀，特荫裔孙守祀。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改封“费公”。

闵氏在全国是个很小的姓，据说总共只有26万闵姓人，其中费县闵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费县汪沟镇闵家寨（2011年划归临沂市兰山区）的闵氏，是孔子高徒闵子骞的后人。闵子骞的长子闵沃盈，死后葬在了闵家寨。《光绪费县志·人物》记载了明代的闵贡、清代的闵广维两位闵氏族人的事迹：

“闵贡，字魁吾，闵家寨人，先贤闵子裔也。性忠厚纯笃，施舟楫，修桥梁，建寨堡，捐粟赈贫，有善人之目。歿后乡人立碑以志感，邑人王政敏手书焉。”

“闵广维，闵家寨人。为东汪社团长，助韩昌泰诛花旗匪有功。许田城被围数日，广维率百人驰往，杀贼无算。贼欲遁，广维追之。贼怒，反攻，炮如雨下，广维死之。肃清后，祀昭忠祠。”（注：韩昌泰是方城人，秀才，适逢土匪作乱，他被推为练长，联合邻近民团共同剿匪，杀敌七十余人）

清代，朝廷在闵氏后裔中选拔闵氏奉祀生，经礼部审查注册，给以衣巾奉祀，负责闵子祠墓的具体事务及祭祀仪礼等。据《光绪费县志·卷七·荫袭》记载：“闵先声，先贤闵子六十七代孙，袭奉祀生；闵植瑄，先贤闵子六十八代孙，袭奉祀生。”



早在宋代，闵家寨村就有闵子骞的祠堂，今天的闵子祠中，存有宋代宰相王旦关于闵子骞的赞辞碑碣。金代资政殿大学士张万公、元代费县县尹邵显祖都留下过碑碣。张万公的碑说：“览《费志》，知费为闵侯恭桑之乡。”邵显祖的碑说：“详览《费志》，邑之东北六十里许有其故宅，乃于桓魋之乱，长子沃盈迁于此而卜居焉。”《沂州府志》卷首绘有“费县图”，图中标有“闵子祠”。今闵林中有闵子骞长子闵沃盈墓。闵氏族人世居此地，而今已有77代。

闵家寨村内的闵子祠，是海内外闵氏后裔的续谱处和祭祀处。闵子祠占地约有20余亩，曾经11次重修，有碑碣100余通。正阳门3间，上悬乾隆皇帝手书“笃圣祠”三个金光大字。

闵家寨是一个以闵姓为主的村落，截至2005年，全村闵姓人口2025人。他们自称是孔子弟子闵子骞的后人。其次是邵、杨、武、孟、李、刘、卓、陈等几个小姓家族，共计218人。该村的闵氏族人，清代早期曾经乱宗，只知道自己是多少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辈份。清代中后期，族中有一庠生，前往曲阜抄袭孔府行辈，自那以后，闵家寨的闵氏族人始步孟氏、颜氏、曾氏之后尘，以孔姓行辈为自己命名的行辈。

闵氏字辈排序为：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 卜 氏

卜氏族系庞杂，源流有十几种说法。其中一说源于姬姓，出自周文王的儿子叔绣（周武王之弟）之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据史书《路史》记载，叔绣曾任占卜之官，其后代有卜氏。在古代，大凡出猎、征战、风雨、年成、祭祀、婚丧、疾灾，都要预知吉凶，于是采用卜甲和卜骨的形式来进行占卜。卜甲多用龟的腹甲或背甲，卜骨多用牛、羊、猪的肩胛骨。先把甲或骨钻上眼，然后再用火烧，从甲或骨裂开的纹路来观察是吉或是凶。据《姓苑》记载：“周礼卜人之后，以官为氏。”又据《风俗通》记载：“氏于事者，巫卜陶匠是也。”商、周朝廷中专管占卜的长官称太卜，其地位相当于大夫，其属从官员称为卜人。他们的后裔有的以卜为姓，称为卜氏。

费县的卜氏家族是先贤卜子的后裔。卜子，即子夏。他姓卜，名商，字子夏，卫国人。子夏是孔子的高足，被列为“孔门十哲”之一，擅长文学，著有《诗序》《易传》等。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为“魏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增谥为“东阿公”，后又改谥“魏公”。

卜氏后裔世居河南怀庆府温县，汉武帝时七代孙卜式迁至巨野，宋代刘豫之乱时四十代孙迁至费县，定居在西北隅安靖社安靖村（今属平邑县），历经元、明、清各朝，族裔繁昌，衣冠济美。村内有卜子祠，是雍正年间卜氏裔孙卜尔裕所建。清代雍正四年费县知县汪泃民撰有《先贤卜子祠》，雍正七年费县知县汪连萼撰有《先贤卜子祠碑记》，乾隆五十九年费县知县马延承撰有《重修先贤卜子祠碑记》，俱收录在《光绪费县志》中。

清代，朝廷在卜氏后裔中选拔卜氏奉祀生，经礼部审查注册，给以衣巾奉祀，负责卜子祠墓的具体事务及祭祀仪礼等。据《光绪费县志·荫袭》记载：“卜之裔，先贤卜子六十五代孙，袭奉祀生；卜照熹，先贤卜子七十一代孙，袭奉祀生。”

《光绪费县志》还记载了卜世威、卜梦弼、卜善端、卜善长、卜青云、卜之霖6位卜氏后人的事迹：

“卜世威，字含真，诚恁义勇。明季之乱，公私倚重。聚义兵捍贼，沂、费、泗境赖以保全。国初，剿院张存仁给以札，令搜捕招抚，以镇山东。”

“卜梦弼，字象升，乾隆丁酉岁贡。性至孝，侍亲疾，衣不解带者数月。尝置林庙、祭田、义学、义仓等事。乾隆五十一年，岁大饥，赈济活人无算。任禹城县训导，进士子，勸以德行。每月课试，细加评阅，人文蔚起。自奉甚俭，服食率由家中自致。事载《禹城县志》。子善端、善长。善端，字统万，邑廪生，侍曾祖母疾，以孝闻。免丧后，每遇忌辰，犹痛哭不止。精医学，晚年著有《数验录》二卷。善长，嘉庆三年诣辟雍听讲，肄业期满，恩赐监生。又族人青云，咸丰三年临雍陪祀，礼成，钦赐《御论语讲章》一卷、贡墨两匣、貉皮两张、妆缎两匹，送国子监肄业，期满恩赐贡生。”

“卜之霖，字湛滋，乾隆间贡生，任博山训导。潜修笃学，至老不辍。”

另有一位明朝时期事迹杰出的卜氏女性，名列《光绪费县志·列女》。她没有名字，称作卜氏，性情至孝。十岁时母亲患了痢疾，她品尝粪便甘苦，以辨别病情变化。17岁时嫁给了唐士恭为妻，一年之后丈夫不幸病逝。公婆觉得她还年幼，商议让她改嫁，后来发现她怀有遗腹子而作罢。生下一个儿子，却是个痴呆儿，七八岁还不会说话。公婆认为抚养这个孩子没有什么益处，就把卜氏许嫁给了商人。已经接受了聘金，卜氏才得知，不肯改嫁，投井自杀，被人救起，改嫁之事才搁置。公婆故意刁难她，让她每天早晨砍柴20捆，每天只给她吃一顿饭。卜氏垢面跣足，天天早起，砍柴如数。公婆看她态度坚决，终于同意让她守寡。婆婆患了眼疾，卜氏用舌头舔舐，终于治愈。后来儿子终于成家立业。隆庆六年卜氏去世，有遗训诫子，刻在石碑上。

清代嘉庆年间，卜氏一支迁至费县诸满村，在诸满已繁衍9代。其字辈排序为：

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 南下浙江余杭 (-)

刘敬宗

1948年秋，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大厦将倾，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进军大江南，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作好南下的思想准备。当时，我任山东沂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命我具体负责搞好人员方案，交县委讨论决定，以便随时待命出发。

1949年2月16日，南下人员在县委驻地远里村集中，有干部80余人，加上勤工共120多人，进行动员、学习、编组、列队。20日启程南下，队伍晓行夜宿，三天后到达地委驻地新泰县南新庄。地委书记董琰同志给大家作了动员报告，并宣布沂南县南下人员编为第三中队。队委书记魏鉴清、队长袁浩、宣传委员李茂生、民运委员刘泽明，我任组织委员，下设班、组。我们28日下午到达临城，在后宫庙休整了一个多月。3月31日早晨六时，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长距离连续行军。全体同志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疲劳的精神，每天步行五六十华里，途经徐州、新安镇、扬州等地，于4月30日下午三时半到达长江渡口。

当时，长江南岸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作垂死挣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不时地在高空盘旋侦察，窥探我们队伍的动向和行踪，形势还十分险恶。但是，敌人再猖狂也阻止不了我们渡江南下的决心，动摇不了我们解放大江南的信心。一声令下，同志们个个如猛虎离山，勇往直前，发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势，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小时之内，胜利渡过了号称“天险”的长江。

到达镇江码头，已是黄昏时分。当时镇江还处在军管时期，情况复杂，不宜久留。登岸以后，我们“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继续开始夜行军。可是天不作美，到了晚上八点钟，开始下起雨来，雨由小到大，越下越大，直到倾盆大雨，下个不停。黄泥路又滑又粘，步履艰难，行李越背越重，人困马乏。离驻地还有40余里，这时，大家心里却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尽快解放江南的苦难人民群众，再困再乏也要走。时间就是命令，前进就是胜利，大家的情绪反而更加高涨。同志们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分秒必争地冒雨急速行军。书记魏鉴清人矮体胖，他用上了所有的力气，不但自背行李，还帮助别人拿东西，且边走边给大家讲红军

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故事，激励大家的情绪。有三个女同志虽然累得精疲力尽，还是不甘心落后，男同志想帮助她们拿东西，她们却拒绝说：“你们男同志能走，我们也能走，保证不掉队。”还调皮地对我说：“老刘，你放心吧！我们不会给你这个管干部的丢脸。”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大家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重重困难，斗志昂扬地向前迈进。

快到驻地的时候，打前站的同志前来报告：饭已准备好了！大家一听高兴极了。一夜来顶风冒雨，长途跋涉，已累得腰酸背痛且又饥又渴，正想喝点水吃点饭休息休息呢。虽然那时粮食紧张，一天只吃两顿饭，这顿饭还是吃得香甜可口，胜似山珍海味。

饭后，稍事休息，继续行军前进，路经丹阳、苏州、吴兴，然后乘船沿运河南下。中队负责人魏鉴清、袁浩、李茂生、刘泽明和我分别与同志们一起背纤拉船，昼夜兼程，终于在5月11日到达杭州。在拱宸桥休整了五天，通过学习、整顿、编组后，省委分配我们去接管余杭县。我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这次南下，历时三个月，徒步3000余里。

1949年5月16日，我们接管了余杭县，宣告国民党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政权的诞生。告示一贴出，全城沸腾，“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给了我们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但是，政权初设，百废待兴。加以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困难重重。特别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灭亡，土匪、恶霸互相勾结，公开与新生政权相对抗。疯狂叫嚣要“消灭山东佬，蒋介石八月半回来吃月饼。”他们身带武器，气势汹汹到处逼款派粮，抢劫民财，威胁群众，气焰十分嚣张，形势险恶严峻，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

余杭县委和全体南下干部，面对险恶的形势，大家立场坚定，不怕困难和牺牲，依靠群众，团结战斗，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历时数月的剿匪反霸斗争。

首先，根据斗争需要，经临安地委批准，在全县建立了在城、闲林、仓前、黄湖、紫荆、径山、仁爱7个区和43个乡（镇）。落实人员，作好组织准备，拉开了斗争的序幕。

1949年7月15日，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布置剿匪反霸任务。会议结束那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天下起了雨，我在县政府门口碰到西社乡指导员王守存同志和乡长沈化贞同志正整装回乡，我对他们说：“天气不好，路也不好走，不妨再留宿一夜，明天回去吧。”他俩说：“为了及早召开会议，把任务贯彻下去，必须在今天赶回去。”临走时，我叮嘱他们“情况复杂，路上千万小心。”就这样，他俩急急上路，冒雨回乡去了。

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王、沈两同志遭到了匪徒的枪杀。县委获悉这一噩耗后，书记魏鉴清、县长袁浩立即率领机关干部奔赴现场，当我们乘的两条小船飞速到达乡政府时，只见王、沈两同志倒在血泊之中，沈化贞同志已经咽气，王守存同志一息尚存。在场同志义愤填膺，当即用小船将他们运回县里，把沈化贞同志的遗体送到四明会馆，把王守存同志送往医院抢救。那时我正患疟疾，发高烧。高振松同志扶着我去医院探望时，王守存同志气息微弱地对我说：“刘同志，我不行了，你们要为我报仇”。说完就咽气了。当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第二天，县委在四明会馆举行了追悼会，县委书记、县长、青年主任、妇联主任和机关干部都参加了。追悼会由县长袁浩主持，我代表县委致悼词，到会同志都为这两位优秀共产党员被害而流泪，决心化悲痛为力量，要为烈士报仇雪恨。

时隔不久，我们得到这股土匪在仓前区活动的情报，宣传部长李茂生同志亲自带

领干部战士前去围剿，武装科长郑清友同志和区委书记王延全同志怀着满腔仇恨奋勇杀敌，亲手击毙了杀害王、沈两同志的主要凶手，洗雪了大家心头之恨，告慰了烈士在天之灵。

七月下旬，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各区乡政府只留下一两个人看家，其余都到县里参加会议。闲林区公所留下了公安员周光信和妇女干部盛英芳。就在那天下午四点左右，数十名匪徒突然包围了区公所，一面开枪袭击，一面狂妄叫嚷要革命干部缴械投降。周光信叫盛英芳离开区里去县里报告，在这危急时刻，周光信同志沉着冷静，坚决果敢，与土匪进行英勇战斗，腿部受了重伤，还是竭尽全力，最后用枪榴弹射向敌群，轰然一声，炸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逃窜。

我们闻讯后，立即组织武装力量，出动两辆汽车赶去救援。待我们到达时，敌人已逃之夭夭，并抢走了14支步枪，但也找不到周光信同志，经四处搜寻，第二天发现他负伤后隐蔽在麦地里，我们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在这场生死搏斗中，周光信同志显示了无产阶级战士英勇无敌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深为同志们所敬佩，盛英芳同志年龄虽小，但也经受了一次考验，其表现是好的。这一伙袭击我区公所的匪徒，后来被群众一一揭发出来，经过调查审讯，分别罪恶大小，给予应得的惩处，被抢的14支步枪也全部缴回。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仓前区和长乐、石湫、吴山、石鸽、中洪等乡，是全县土匪活动猖獗的地方。仓前沈家头村土匪头目余富喜和吴山乡匪首吴某、牛二等，勾结一起，敲榨勒索，鱼肉乡邻，抢杀好淫，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他们公开扬言要消灭山东佬，把南下干部赶回山东去，他们威胁积极分子不要靠拢我们，余富喜几次企图杀害我农村工作组同志。长乐乡的匪徒深夜荷枪实弹，在我乡公所驻地游弋，企图袭击乡公所，慑于我有所准备，才没敢下手。石獭乡的匪徒在晚上二次用石头砸区公所的大门，当区委书记持枪追出时，却又逃之夭夭。后来，匪徒们打听到王佃伦同志是武装干部出身，打仗勇敢不怕死，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尽管这些匪徒一时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但终究是日落西山大势已去，充其量不过是回光返照、垂死挣扎罢了！我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军民团结，并肩战斗，四处出击，反复清剿，仅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击毙了一批，俘获判处了一批，被群众揭发出来抓获镇压了一批，也有个别的逃往外地。到1949年末，肃清了全县匪患。

**孟庆斌对市委党史研究院打造红色堡垒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做法作出批示。**近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下发通知，对临沂打造红色堡垒村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做法在全省学习推广。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庆斌对此作出批示：市委党史研究院挖掘红色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做法，受到省委党史研究院的肯定，向大家表示祝贺。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创新举措，走出一条有临沂特色的红色资源助力发展的路子。

**市委党史研究院获评省级文明单位。**近日，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下发《关于命名表彰2019年度省级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社区的决定》，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被授予“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主题教育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1月9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传达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全院上下务必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主题教育学习成果和党史史志工作实际紧密结合，立足岗位忘我奉献，为“大美新”临沂建设贡献全部力量。大家在讨论中表示，要将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立足党史史志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一项一项落到实处、落实到位。

**市委党史研究院到“第一书记”任职村走访。**1月9日—10日，市委党史研究院领导班子成员到“第一

书记”任职村——郯城县港上镇王桥村、费县马庄镇富民新村，开展“结亲连心”走访慰问活动。走访人员一行先后走访村内联系户、困难群众20余户，向群众送上了慰问品、慰问金，并叮嘱村干部要多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离退休老干部走访慰问活动。**1月9日—13日，市委党史研究院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分头走访慰问单位离退休老干部，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向他们送上组织的关怀和祝福。院领导班子成员分头走访，来到离退休老干部家中，通报了单位工作情况，听取了老干部对党史史志工作的意见建议。

**市委党史研究院到“双报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月20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扎实推动进社区“双报到”工作，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党员到兰山区通达社区，开展“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奋进2020”春节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向社区送“福”活动，捐赠“福”字、春联等，送上新春祝福；开展环境卫生清洁志愿服务，共打扫路面2000余平方米，清理垃圾100余堆；积极开展党史史志工作宣传，赠送党史史志书籍杂志200余册。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有我”志愿服务活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结合社区“双报到”工作，2月11日，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党员干部到兰山区兰山街道通达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有我”志愿服务活动。志愿人员代表单位向社区捐

赠医用口罩300个、医用酒精30公斤、大型喷雾器4件，解决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燃眉之急，并积极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出入人员登记、疫情防控宣传等工作。

**市委党史研究院依托“学习强国”平台开展疫情防控集体学习。**2月21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召开视频会议，传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信息，并对近期工作作了安排部署，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全省、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新情况，通报了市纪委关于疫情防控的2则典型案例，对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和省市委疫情防控文件通知的个人自学进行了安排。院长李洪彦就疫情防控和近期工作做了布置。

**《莒南南下干部》出版发行。**由莒南县党史研究中心（县地方志研究中心）编撰的《莒南南下干部》一书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